

醫與文，仕與隱—— 明初吳中醫者之形象與社會網絡

劉小濤*

吳中醫者之盛自明初而始。本文著重考察這群醫者之生涯的一個側面：士人交遊與社會網絡。根據不同的「生涯模式」，本文將明初的吳中醫者大致分為兩類：宮廷醫官與隱逸醫者。在元末明初政治與社會環境的壓迫下，不少吳中士人選擇以醫為業，雖然他們的人生選擇分別通向入仕與隱逸兩條相反的道路，但其身分與性格並非截然不同。他們之間大多有著師承甚至親緣關係，並在士人之間廣泛交遊，同時在儒與醫之間界定自己的身分，因而獲得了突出的名聲。這種醫、士交往的社會網絡與儒醫性格逐步在吳中醫者之中延續了下來，成為他們在後世長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關鍵詞：吳中、宮廷醫官、隱逸醫者、儒醫、社會交往

*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一、陸容之疑——醫官生涯的側面

陸容(1436-1497)，字文量，號式齋，蘇州府太倉人。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他始在朝廷為官，聽聞了兩位同籍長者的事蹟，此二人雖無高官厚祿，卻深得館閣大臣的敬重。陸容在其《菽園雜記》中寫下了自己的疑問：

醫士劉溥，字原博，博學能詩。畫士范暹，字啟東，讀書善談。

二老皆蘇人，在宣德、正統間，館閣諸公皆愛重之。原博僅官太醫吏目，啟東終身布衣而已。意者當時士人皆知自重，不肯

干人，當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厚而然邪？吾於是不能無感。¹

如今提起劉溥與范暹這兩個名字，即使在當今的醫學史及藝術史領域，知名度也不高；然而在他們所生活的時代，卻在士人社交圈中享有盛名。二人皆為蘇州府人士，並供職於宮廷，雖以行醫、作畫為業，但真正讓他們與館閣大臣交往游刃有餘的，卻不是他們的「本業」。「博學能詩」、「讀書善談」，這些頗具儒士色彩的特點讓他們脫離了單純「工」的身分，被時人、至少是被陸容，視作「士人」。

不同於現今難以將醫生與畫家相提並論，在陸容生活的時代，兩職業的社會地位卻有一定的相似性。劉、范二人將「儒」的性格與「工」的職業完美的結合，進而躋身士人之列，在當時並非獨特的現象。畫家並非本文將關注的重點，不過我們仍能從中得到啟發。范暹的作品沒能流傳至今，關於他的生平材料也僅限於隻言片語，在傳統藝術史中很難落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在永樂年間(1403-1424)進入宮廷畫院，葉盛(1420-1474)稱讚他「善花鳥，有談論」，因而十分器重，他的形象

¹ 陸容，《菽園雜記》，卷8，頁100。

也因這一評價而最終定格於時人筆下：博學健談而得到館閣大臣的賞識。²此種形象也將我們的目光引向畫家生涯的另一面，即繪畫創作之外的社交活動。

當今藝術史領域最今人注目的兩種走向便是「圖像的文化史」與「藝術的社會史」，二者皆跳脫了傳統藝術史中的風格分析。前者注重圖像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圖像的社會功用以及視覺文化；而後者則將藝術家還原為社會中的個人，關注其生活、工作及社會交往，本文主要受益於此視角。高居翰(James Cahill, 1926-2014)的《畫家生涯——傳統中國畫家的生活與工作》(*The Painter's Practice: 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可算是在他豐碩的中國繪畫史成果中的另類，此書一反他其他作品的風格分析路徑，轉而從社會史的角度，昭示了中國傳統文人畫家理想形象背後的生活狀態。³有趣的是，正如我從他的研究中得到啟發一樣，高居翰最初亦得到席文(Nathan Sivin)關於中國醫者角色研究的啟示。席文認為：

在文化菁英的思想裡，(受過技術訓練的)御醫不僅沒有特殊地位，他們的姓名也無人知曉。人們唯一耳熟能詳的大夫，只能是來自士大夫階層菁英當中有才華和天賦的業餘大夫。作為醫生，

² 范暹小傳參見方鵬，《崑山人物志》，卷8，頁5a；張昶，《吳中人物志》，卷13，頁25a；朱謀壘，《畫史會要》，卷4，頁13b-14a；姜紹書，《無聲詩史》，卷6，頁12b-13a。其中《無聲詩史》載其字為「起東」。

³ 最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策劃翻譯出版的《開放的藝術史叢書》中亦有幾部專書從社會史的視角研究特定畫家的生涯、創作與社交活動，如喬迅(Jonathan Hay)，《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柯律格(Craig Clunas)，《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Elegant Debt: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1470-1559*)。

為他們帶來名聲的是其社會地位，而非其醫生的角色。⁴

高居翰將其稱為中國文人的「業餘化」理想，並用以指稱傳統中國畫家追求的理想形象。對於藝術史領域，筆者不敢妄加評判。⁵然而評價中國醫者，這種類型的醫者如今(也在當時)大多被稱為「儒醫」，說他們是「業餘的」，恐怕有些過分。⁶然而席文的觀察十分敏銳，醫名固然重要，但作為儒者或文人的名聲，更能讓他們充分融入以士人為主導的上層社交圈中，至少在明代前期，這種現象十分明顯。

以此視角觀察中國醫者，劉溥便是個典型的例子。他出身於醫學世家，祖父劉毅(字彥敬)侍奉明成祖朱棣(1360-1424, 1402-1424 在位)於藩邸，後因罪謫戍。成祖即位後，念藩邸舊臣之功，遂召還劉毅之子劉觀(字士賓)為御醫，後升任太醫院判，其子即劉溥。⁷劉溥跟隨祖、父遊學兩京，雖繼承家學，卻更傾心於儒術與詩文。時人給予他很高的評價：「自吾儒經世之書，以及諸子百氏之言，靡不讀，讀之靡不探其蹟而鉤其深，其於辯析物理，議論今古，縷縷其弗絕，亶

4 高居翰，《畫家生涯——傳統中國畫家的生活與工作》，頁 6。高居翰引述席文未刊手稿“Ailment and Cure in Traditional China: A Study of Classical and Popular Medicine before Modern Times,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sent,”並在註釋中指出，所謂「業餘」並非意味著中國傳統醫者在醫術上的不足。

5 不過柯律格並不贊同這種「職業」與「業餘」的二分法，他以陳洪綬(1599-1652)的例子說明，「業餘」或是「職業」是兩種可以互相妥協的社會身分，是幾乎可以任意摘掉的面具，而不是固定不變、難以擺脫的社會標誌。見柯律格，《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頁 41。

6 趙元玲將明清時期的「儒醫」理想視為中國傳統醫者群體「職業身分認同」形成的一種標誌，並將其作為明清時代中國醫者「職業化」的重要表徵。儘管她的初衷並非回應席文的觀點，但在此意義上卻與之完全相反。參見 Yüan-ling Chao, “The Ideal Physici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Question of Sanshi 三世,” pp. 66-93.

7 林世遠、王鑒等纂修，《(正德)《姑蘇志》》，卷 56，頁 11a。

亶其不厭也，至發為文章，蒼然古色，有作者之風焉。」⁸宣德初年，劉溥以文學徵召入仕，有人言其善醫，因而授以惠民局副使。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後，景泰帝(朱祁鈺，1428-1457，1449-1457在位)即位，知情者再次舉薦劉溥，卻未得應允。僅秩滿後，依例升遷為太醫院吏目。醫官並非劉溥的志向，他也恥以醫者自稱，終日與文士交遊，賦詩唱和，談笑風生。景泰年間，與湯胤績(?-1467)、蘇平、蘇正、沈愚、王淮、晏鐸、鄒亮、蔣主忠、王貞慶並稱「十才子」，⁹而劉溥

⁸ 徐有貞，《武功集》，卷4，〈送劉原博序〉，頁66b。

⁹ 關於景泰十才子，不同史料的記載略有不同，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蔣主忠 / 蔣忠」其人。明代材料筆者未見將十才子姓名盡列者。清人朱彝尊(1629-1709)《曝書亭集》將十才子名、字詳列，其中有「儀真蔣忠字主忠」，見朱彝尊，《曝書亭集》，卷63，〈劉溥傳〉，頁14a-14b；而在其《靜志居詩話》中列並未提及十才子中的晏鐸和蔣忠，想來他並未見到二人的詩作，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7，頁25b-29b。《明史》中關於「十才子」的記載也在此人身上出現了矛盾，列傳中稱「蔣忠，字主忠，儀真人」，見張廷玉等，《明史》，卷286，〈文苑傳二〉，頁7341。而〈藝文志〉則列「蔣主忠」，與之並列的其他九人皆稱姓名而不稱字，因而主忠也應為名而非字，見張廷玉等，《明史》，卷99，〈藝文志四〉，頁2467。列傳中的記載很可能受到朱彝尊的影響。查劉溥《草窗集》，內有〈送蔣主忠南歸〉詩一首，見劉溥，《草窗集》，卷下，頁17b-18a。因而此人極有可能是蔣主忠而非蔣忠。蔣主忠，字存恕，明太醫院判蔣用文(1351-1424)幼子，其兄長蔣主善亦曾任太醫院判，其家本儀真人，後徙句容，此亦與《明史》列傳記載相合。蔣氏四兄弟中，此子雖為年幼，但頗有文才，可參見曹溶，《明人小傳》，頁298-304。錢謙益(1582-1664)雖然仍將此人記為「蔣忠，字主忠」，但明言其為蔣用文子，蔣主孝(1397-1472)弟；而在其後條目亦列蔣主孝，字務本，見錢謙益，《列朝詩集》，乙集卷7，頁25a-25b。但他沒有注意到，如此二兄弟命名何以差異如此？實際上，蔣用文為其四子命名為「主善、主敬、主孝、主忠」，其幼子斷無「名忠，字主忠」之理。見楊士奇，《東里文集》，卷7，〈贈蔣主孝序〉，頁18a。

則被推為「盟主」。¹⁰

劉溥作為太醫院吏目，已身處伎術官之列，其醫術兼通內外科，我們很難說他是個「業餘醫者」。但正如席文所言，真正讓他在當時聲名鵲起的，是詩名而非醫名。筆者所見關於劉溥的記載中，找不到任何他行醫的材料，反而是其詩歌常見於各種明人詩文彙編中。關於他的軼事，顯示也是他的詩才與辯才。他並沒有留下任何醫學著作，反而存有詩集一部。乃至於在《明史》列傳中，他被列於「文苑」而非「方伎」。面對這一類醫者，我們不得不將目光移至中國傳統醫者的另一面，即其生活與社會交往。

醫者的社會交往遠非「醫患關係」所能概括。¹¹醫療史中的「醫患關係」，就像藝術史中「藝術家——贊助人」一樣，是在相關社會史研究中最受關注，也是研究最為深入的課題，畢竟這是醫者與畫家以他們的「專業」身分進行社會交往的最普遍形式。但這兩組從西方研究中形成的對應概念並不能全然符合中國經驗。傳統的醫生與畫家，更接近於西方所謂 *occupation*，而非 *profession*。¹²相對而言，他們屬於地位低下的「工」階層，但以儒自詡的醫者如劉溥一樣，拒絕

¹⁰ 朱彝尊對劉溥詩作頗有微詞，認為「矜譽過其實」，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7，頁26a。晚清學者陳田(1849-1921)對此「十才子」之稱很不以為然，「原博在景泰中負盛名，惟律體及絕句差又可觀，當時如童士昂、聶壽卿輩均不得與十才子之列，時論之不足信如此。」參見陳田，《明詩紀事》，乙籤卷20，頁1b。

¹¹ 明清時期醫患關係的研究，可參見Che-chia Chang,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1874-1908)," pp. 1-249；祝平一，〈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頁1-50。

¹² 雖然這兩個英文單詞皆可譯為「職業」，但其內涵有明顯差異，任何職業都是 *occupation*，但是只有需要水準特別高的教育且由此獲得高的社會地位的職業才是 *profession*。參見席文，《科學史方法論演講錄》，頁33。

將「工」的標籤貼於自身，反而追求一種更靠近儒的理想形象。他們劃定自身與下層「醫工」的邊界不僅僅靠觀念上的區隔，也深深根植於他們日常行為與實踐當中。他們大多並不排斥為普通百姓治病，因為那正是他們踐行儒者「仁心」的重要途徑。然而更為他們所重視的，大概是如何在上層的士人社交圈經營人脈，獲取聲名。

陸容對此二人的生涯提出疑問：既然他們如此被當時的館閣大臣器重，為何官階卻如此之低？他繼續回答道，或許是當時的士人皆知自重，不肯干謁高官以謀職位；而且當權之高官也不肯因一己之私而將官職授予自己所器重的人。以劉溥的經歷來看，陸容自以為是的答案並不準確。劉溥八歲曾做《溝水詩》以示其凌雲之志。¹³他有著入仕之念，入仕為官是傳統時期文人的普遍理想，劉溥八歲時的志向恐怕也不例外。但他最終非由科舉正途入仕，而因徵召成為一名醫官。他也並非無人舉薦，但終未能擺脫醫官的身分。他的經歷，更反映出明代技術官向文官遷轉的困境，而非如陸容所言的重名節。其友人也並不惋惜地感歎：「原博之志殆不止乎醫而已也，余輩之所以知原博，期待原博者，亦不止乎醫而已也。」¹⁴

但陸容的回答並非空穴來風，文人干謁求官，高官乃至皇帝因一己好惡而將官職私相授受，大概在陸容生活的年代非常普遍。¹⁵因而他極為讚賞宣德、正統間的清流之風。當然這種風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對於明前期政治風氣的想像。

陸容、劉溥、范暹，三人皆為蘇州府人士，以此為開端，本文亦

¹³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 84，〈國朝〉，頁 1a。

¹⁴ 徐有貞，《武功集》，卷 4，〈送劉原博序〉，頁 66b。

¹⁵ 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成化朝以來官場「傳奉升授」的風氣，關於這方面的狀況，可參見方志遠，〈「傳奉官」與明成化時代〉，頁 41-62。

擬對所謂的「吳中醫派」進行探討。¹⁶但本文不會將目光限定在狹義的蘇州府一地，除了以蘇州府為籍貫的醫者之外，亦將關注另一類醫者：他們並非蘇州人，但曾在蘇州府活動，或在蘇州文人與醫者圈子中交遊廣泛，因而深深捲入了這一群體之中。¹⁷

明清時期吳中醫者之興盛很早便吸引醫療史學者的目光，此論題也不乏優秀的研究。吳以義對劉完素(約 1132-1208)、朱震亨(1281-1358)學派傳承的細緻的研究，雖未明言，但明初的諸多代表人物無疑都集中於吳地。¹⁸邱仲麟詳細勾稽了多個江蘇世醫家族的基本脈絡，並探討明中期以後納捐制度對他們的影響。¹⁹趙元玲關注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吳中醫者，著重考察其社會結構和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趨向。²⁰張哲嘉也比較了吳中醫派和新安醫派兩個地域性醫學集團的源流，並嘗

¹⁶ 「吳中」這一歷史稱謂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之吳中僅包括明代蘇州府下轄的一州七縣，廣義上仍包括蘇州府周圍的松江府、常州府以及浙江的湖州府、嘉興府。歷史上所謂「吳門醫派」、「吳門畫派」多僅就狹義的蘇州一府而言。不過自元末至明代，廣義的吳中一地在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中具有相當大的同質性，雖然明中後期有「吳門畫派」、「松江畫派」之別，但兩者也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對於醫者研究而言，蘇州府與周邊府州縣更難以區分，因而本文對「吳中」一地的處理多採取廣義上的地域範疇。

¹⁷ 張哲嘉指出，吳中醫派系以居住地，而非籍貫為基礎，吳中作為醫學都會，吸引來自各地的醫生，進而形成一聞名天下的醫學社群，因而將吳中醫派的討論擴及其周邊區域自有其合理之處。參見張哲嘉，〈明清江南的醫學集團——「吳中醫派」與「新安醫學」〉，頁 264。

¹⁸ 吳以義，〈溪河溯源——醫學知識在劉完素、朱震亨門人之間的傳遞〉，頁 57-94。

¹⁹ 邱仲麟，〈綿綿瓜瓞——關於明代江蘇世醫的初步考察〉，頁 45-67；他另一篇更深入論述世醫與地方醫學關係的文章是〈明代世醫與府州縣醫學〉，頁 327-359。

²⁰ Yüan-ling Chao,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1600-1850*.

試解釋其形成原因。²¹本文承繼前人對於吳中醫者的關注，探討的核心人物也大多出現在吳、邱的文中，但我意圖探討不同的話題，希望呈現當時社會中醫者的另一種面向：更關注社會網絡而非醫術傳承，更關注個人不同身分間的交融而非僅集中於醫者這固定的形象。

陸容的言論在他的時代並非個案，而劉溥的生涯也絕非特例。我們需要將探尋的目光繼續延伸，尋找明代士人對醫者的評價與想像。既然我們從畫家生涯的討論開始，那麼就再由一幅畫完成此轉折。

永樂十五年(1417)十月十五，醫學正科盛寅(字啟東，1375-1441)自京還吳，途徑丹陽，吳門畫派名家謝縉作畫題詩相贈，是為《雲陽早行圖》。²²謝縉字孔昭，號蘭庭生、深翠道人，晚號葵丘翁。此畫題款自稱葵丘，可知為謝縉晚年作品。通過此畫，醫者又與畫家相遇。

「長松夾道，短筇駕溪，隔岸層巒潑黛，蒼翠欲滴」，²³在謝縉代表性的蒼翠疊山之上的留白處，自然少不了題詩相贈。劉溥的題詩出現在謝縉題詩的右側，而在天池之上，另附一紙，上有淮南蔣用文(1351-1424)、雲間許士深、吳門史謹、蘄陽朱彤、淞南蔡昶五人題詩，其中生平可考者蔣用文、史謹皆較劉溥年長。這幅畫將三位活躍於不同時期的宮廷醫官聯繫了起來，卻不是通過醫術而是題詩。除劉溥與盛寅之外，蔣用文是另一位在明初頗負盛名的宮廷醫官。就年齡而言，蔣用文、盛寅大概算是劉溥長輩；而就醫名而言，他們顯然要比劉溥更盛。接下來我們便將目光轉移到他們生活的時代。

²¹ 張哲嘉，〈明清江南的醫學集團〉，頁 256-267；另有關於兩種醫學流派的比較研究，參見馮麗梅，〈醫學地域化——明清吳中醫家與新安醫家比較研究〉。

²² 《雲陽早行圖》現藏上海博物館，其畫作介紹、題詩錄文及相關考釋參見單國霖，〈謝縉「雲陽早行圖」〉，頁 251-254。

²³ 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卷 3，頁 3a。

二、「文名」醫官——蔣用文與趙友同的例子

弘治年間禮部尚書吳寬(1435-1504)曾這樣描述永樂一朝之文治：

昔在永樂間，文治既興，人才振迅，爭欲出為世用，文學吏事蔚然可觀，至於書藝醫術，亦極一時之選，蓋文皇帝在位，造就作興，以遺後聖無窮之用者也。²⁴

永樂一朝，破格用人之例較洪武朝時已大為減少，「蓋資格既定，天下之才遂胥出於是，非必資格外別有非常之才，為網羅所不及也」。²⁵吳寬將「文學吏事」一類的文官與「書藝醫術」一類的伎術官並稱，更多是因為他贈序的對象是一位兼具「文學之良」與「醫術之妙」的儒醫沈玄(1369-1432)。然而此一個案卻可以概括永樂朝太醫院醫官的重要特點，蔣用文與趙友同(1364-1418)便是這一時期的代表。

蔣用文，名武生，字用文。但他後來以文學與醫術出名，原名「武生」便極少有人提及。其家世代業儒，曾祖蔣應茂在元初為避兵禍遷至揚州儀真。自蔣應茂之子蔣用雷始，其家兼而業醫。蔣用雷官至揚州醫學教授，其子蔣宮在元末中進士，蔣用文即為蔣宮之子。²⁶

蔣用文早年隨父至蘭陽，父歿後返回故鄉儀真，但家業已遭兵毀，便徙至句容，在此其文名與醫名得以傳揚。他因母親年老，雖屢受薦舉，卻不肯外出為官。²⁷父母去世後，他於家中築「永思堂」以祭，事死如事生。其父力學成家，希望家門得以揚名，而其外祖也曾

²⁴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41，〈潛齋詩集序〉，頁5b-6a。

²⁵ 趙翼，《陔餘叢考》，卷18，頁357-358。

²⁶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7，〈蔣氏族譜序〉，頁4a-5b。

²⁷ 陳繼，〈蔣用文傳〉，收入焦竑，《國朝獻徵錄》，卷78，頁16a-18b。

教導他不要辱沒家門，要「俾人謂蔣氏有子，魏氏有甥也」。²⁸蔣用文最終沒有辜負親人的厚望，洪武初年進入太醫院，並得到太醫院使戴思恭(1324-1405)的賞識，擢升御醫。永樂八年(1410)，升為太醫院判，專於文華殿侍奉當時尚為太子的仁宗朱高熾(1378-1425，1424-1425在位)，深得信任，「仁宗皇帝在東宮二十年，太醫惟院判蔣用文最見親厚，藥非用文制不進」。²⁹

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一日，年逾七十的蔣用文病故北京。蔣用文故去後六日，成祖亦龍御歸天。初登大位的仁宗皇帝給與這位曾在東宮悉心侍奉的醫官以極高的榮譽，「詔贈用文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諡恭靖，遣官賜祭，而官其長子主善為太醫院判」。³⁰

即使專以其醫官生涯視之，他也並非如顧起元(1565-1628)所言，僅「以技藝小臣侍上起居」。³¹他深知當務之急，所言對太子多有幫助，因而與太子愈加親厚。³²他除了在宮中悉心侍主，也在當時的文臣與士人之間享有盛名。一方面是因為他醫術高明，亦頗有德行，「王公貴人，下逮氓隸，得疾，眾所難愈者，謁用文，治即愈，謂不可愈，無復愈者。其報不報，未嘗計」。³³另一方面則因其文才出眾，與士人交往頻繁，「溫雅重厚，績學有文，雖其官為醫，而其所志業不專

²⁸ 解縉，《文毅集》，卷9，〈蔣氏永思堂記〉，頁34b-35b。

²⁹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36，〈太醫院御醫沈君墓誌銘〉，頁28a。

當蔣用文升遷之時，姚廣孝曾做賀詩一首相贈，見姚廣孝，《逃虛子詩續集》，頁82。

³⁰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6，〈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諡恭靖蔣公墓表〉，頁16b-19a。

³¹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3，頁72-73。

³²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6，〈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諡恭靖蔣公墓表〉，頁17b。

³³ 陳鏞，〈蔣恭靖別傳〉，收入焦竑，《國朝獻徵錄》，卷78，頁14b-16a。

在醫也，其所存心持身，及交遊往還，皆儒者也」。³⁴與其傳記及墓誌銘不同，在當時文人贈序之中，蔣用文隱去了醫者的形象，顯出了儒者與文士之面貌。

明代五朝重臣楊士奇(1366-1444)亦曾在永樂年間於東宮輔佐太子，因而與蔣用文交好，親若兄弟，在其《東里集》中有多篇贈予蔣用文及其子嗣的詩文。他曾說：「余仕於朝三十年，同朝自六卿及近侍諸司，凡其正貳，操行賢否，才藝高下，概知之。至同僚同志，相資相悅如一家兄弟，若太醫院判袁士珍(1363-1424)、蔣用文者寡矣。」³⁵蔣用文亦多次為其療病，甚至於臨終時，亦致書一封與楊士奇。蔣主善亦請楊士奇為其父做墓表。二人交情由此可見。

楊士奇曾讚揚蔣用文「以儒承家，以醫歷官，以仁存心」，³⁶時任南京禮部尚書的倪謙(1414-1479)在為蔣主孝做墓誌銘時，追溯其父，亦稱讚「以文學德行歷事三朝」。³⁷

蔣用文在其京師居所築一齋名「靜學」，又在公署旁建一齋名「緝熙」，其中：

圖籍充牣，稍暇即齋中研玩、讎校，未嘗釋卷。喜為詩文，遇名賢所制，率自抄錄，蓋雖老，學問不倦。文人韻士過從者無虛日，賓至必置酒，或五行，或七行，吟詠為樂，與人交，表裡始終一致。³⁸

蔣用文為此二齋命名頗具深意，「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言也；非

34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3，〈緝熙齋記〉，頁10a-10b。

35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32，〈贈太醫院使袁君墓表〉，頁8a。袁士珍，名寶，亦曾於東宮侍奉太子朱高熾。

36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7，〈蔣氏族譜序〉，頁5b。

37 倪謙，《倪文僖集》，卷29，〈蔣務本先生墓誌銘〉，頁10a。

38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6，〈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諡恭靖蔣公墓表〉，頁16a。

靜無以成學，諸葛武侯之言也。吾志在是」。³⁹緝熙齋是他「退宴閒遊息」之處。「緝熙者，繼繼而光明之者也」，代表君子「湛然清明」之「本然」，而求之則難矣。蔣用文以此自警，楊士奇亦以此自勉。⁴⁰靜學齋則多為其讀書、會客之所，其詩文集即以此齋為名。楊士奇與他同朝為官二十餘年，每次過靜學齋時，「未嘗不置酒樂客，客與公東西坐，則其四子以序侍立」。⁴¹而蔣用文在此會客、唱酬，所得詩文數量頗為可觀。翰林修撰梁潛(1366-1418)一日偶過靜學齋，讀諸公所做之靜學齋詩，喜而為之序。⁴²

蔣用文家於句容龍潭，從南京出朝陽門東約 60 里，山水環繞，頗稱勝地。蔣用文將此地析為十景，並作詩詠之。⁴³自其為官後，兩京之「縉紳君子」亦多以此為題作詩唱酬，其中包括了文淵閣大學士金幼孜(1367-1431)，他曾在永樂朝為太子侍講，而與蔣用文熟識。詩文既已成編，楊士奇又為之作序，龍潭一時成為當時士人津津樂道之所。⁴⁴

當蔣用文去世之時，「無貴賤戚疏，咸嗟謬悼惜」。⁴⁵與之素來交好的兩京士大夫皆「作歌詩以哀挽之」。其子蔣主善將其編為一帙，並請內閣首輔楊榮(1371-1440)作序。楊榮稱「予於公交最久且厚」，並述及蔣用文曾悉心治癒他的寒疾。⁴⁶

蔣用文與當朝重臣之交善，歷歷在目。然而與其「交遊往還」之

³⁹ 陳繼，〈蔣用文傳〉，頁 16a-18b。

⁴⁰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 3，〈緝熙齋記〉，頁 10a-11b。

⁴¹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 7，〈贈蔣主孝序〉，頁 18a。

⁴² 梁潛，《泊菴先生文集》，卷 6，〈靜學齋序〉，頁 7a-8b。

⁴³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 4，〈龍潭十景為太醫院判蔣用文賦〉，頁 41a-43b。

⁴⁴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 8，〈龍潭十景序〉，頁 5b-6b。

⁴⁵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 16，〈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謚恭靖蔣公墓表〉，頁 18a。

⁴⁶ 楊榮，《文敏集》，卷 13，〈太醫院使蔣公挽詩序〉，頁 7a-8b；黃佐，《翰林記》，卷 16，頁 210。

儒者、訪其靜學齋之「文人韻士」、素來交好的「兩京士大夫」，多已難以留名，有跡可考者有太醫院吏目劉溥，畫家王紱(1362-1416)，還有那位在謝縉贈盛寅的畫作上題詩的史謹。⁴⁷

蔣用文的《靜學齋集》今已不存，我們很難直接觀察蔣用文的文才。不過通過時人描述以及他與公卿大臣、文人雅士的交遊，可從側面看出一副全然不同於傳統醫者的形象。時人筆下很少出現正面描寫他醫術的文字。在其畫像贊詞中，數位大臣無一不著力凸顯其儒醫的形象，將其儒行與醫道並稱：「匪曰究通乎經術之懿，實亦兼盡乎醫師之良。」又稱：「此蓋通夫岐黃之學，習夫孔孟之書。」⁴⁸蔣用文之所以能在當時的宮廷醫官中脫穎而出，得到如此多公卿士大夫的贈言，不能全以皇恩眷顧解釋。這些公卿大臣也並不特別提及蔣用文為其療病的經歷，反而是他的儒行、文才與好交遊等特點廣受美譽。

梁潛(1366-1418)回憶自己在翰林院供職的七年間，得以交往兩位「忠信慈厚」之士，即烏江蔣用文、姑蘇趙友同。梁潛曾任《永樂大典》副監修、副總裁，在監修鄭賜(?-1408)去世後，翰林院推薦梁潛代之。⁴⁹在此時，梁潛得以結識蔣、趙二人。隨後，梁潛入東宮輔佐太子，「進與蔣君接跡而並趨，退而與趙君有校讎講益之雅，相得益密」。他評價二人：「蔣君與人處洞豁，不為深隱，人人愛悅之；獨趙君澹然恰漠，雖於醫亦不屑。然二人者，中情甚相似，皆善文辭，皆有得於靜者。」⁵⁰

47 三人贈蔣用文詩作分別見劉溥，《草窗集》，卷下，頁 14b、34a-34b、40b-41a；王紱，《友石先生詩集》，卷 3，頁 6b；史謹，《獨醉亭集》，卷中，頁 19ab-20a、30a。

48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 10，〈太醫院判蔣用文畫像贊〉，頁 50a；楊榮，《文敏集》，卷 16，〈蔣院判畫像贊〉，頁 16b-17a。

49 參見王重民，〈《永樂大典》纂修人考〉，頁 171-173。

50 梁潛，《泊菴先生文集》，卷 6，〈靜學齋序〉，頁 7a-8b。

二人的性格多少會影響他們的仕途，蔣用文為人豁達，備受敬愛；趙友同則澹然處事，無欲無求。他們對醫者身分的態度也截然不同，蔣用文對此並不排斥，且能盡職盡責，悉心事主；而趙友同則與劉溥的態度相似，不屑為醫官。

趙友同，字彥如，本出身名醫之家，其父趙良仁(1315-1395)師從朱震亨(1281-1358)學醫，治病奇驗，聲動一時。⁵¹趙良仁於明初定居長洲，同郡夏建中盡得其傳。⁵²趙友同雖承其父醫術，但志不在此，他曾師從宋濂(1310-1381)，「為文章貫穿經史，優柔鎮栗，或豐或約，必歸宿於理」。洪武末年，他初為華亭訓導，九載滿考當升，因姚廣孝(1335-1418)言其知醫，便被授予太醫院御醫一職。此經歷與劉溥頗為相似，僅因人一言，便入技術官之流，深違其心。然而趙友同比劉溥還要幸運，其治水與文學才能屢獲大臣舉薦，皆得以任用。浙西大水(1403)，他隨戶部尚書夏原吉(1367-1430)前往治理；參與修纂《永樂大典》，與蔣用文同時被任命為「醫經方」之副總裁，後又在四書、五經與《性理大全》等數次朝廷修書工程中任纂修。因在數次修書工程中的出色表現，他極有可能遷轉文官，任職翰林院，不僅其友人紛紛為之歡喜，他亦如此希望。然而，因母親故去，突如其來的變故讓他的仕途戛然而止，他歸家居喪，繼而一病不起，於永樂十六年(1418)四月一日病逝。他較蔣用文年幼，卻比其早喪，終未能實現其仕途的理想。不過，楊士奇為他所作的墓誌銘中總結其一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此，其可謂榮遇而無憾也矣」。⁵³

趙友同與蔣用文的仕途經歷不同，雖同為醫官，但職任也頗具差異。蔣用文入東宮服侍太子，而趙友同職銜則是「修職郎、太醫院御

⁵¹ 張昞，《吳中人物志》，卷 13，頁 20b。

⁵² 都穆，《都公譚纂》，卷上，頁 371-372。

⁵³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 18，〈御醫趙彥如墓誌銘〉，頁 9a-10b。

醫兼文淵閣副總裁」，後來實際從事的多是修書工作。梁潛稱「退而與趙君有校讎講益之雅」，此之謂也。

趙友同留有《存軒集》一部，至清朝修《四庫全書》時仍存世，但僅列於存目之中，未流傳至今。集中有賦、頌、記、序、雜文而無詩，⁵⁴四庫館臣評價他「文沿南宋余習，頗為平衍，在明初未能挺出」。⁵⁵即使如此，我們仍可見到士人對他文才的讚賞，尤其他與楊士奇、王紱、王偁(1370-1415)、王燧皆有詩歌唱酬。⁵⁶與蔣用文相比，現存贈與趙友同之詩作要少得多，不過這些詩作有一極為突出的特點，贈蔣用文之詩作題名中皆標明其身分「御醫」或「院判」，而贈趙友同詩作題名則逕稱其名或字。不僅如此，這些詩作無一字表明趙友同醫者的身分，反而對其文才讚賞有加。⁵⁷

蔣用文、趙友同二人則分別代表了明初宮廷醫官的一種「另類」性格的兩種面向，二人皆以文才揚名於公卿、士人之間，不同的是，蔣用文安於其醫官的身分，且因悉心事主而備受恩寵，雖然未來得及等到仁宗即位便與世長辭，但也獲得了空前之身後恩榮，並蔭及後輩；趙友同則不然，雖身為醫官，心繫文職，多獲任用卻未等到擺脫醫官的身分便已遺憾離世。以此觀之，顧起元視蔣用文為「技藝小臣」，而沈德符(1578-1642)為趙友同歎惋則可理解。⁵⁸醫官的社會身分顯示出一種糾結的姿態，一方面，自宋之後，良醫被認為堪比良相；

54 然而現確有題名趙友同之詩作存世，見趙友同，〈題子固蕙蘭卷〉，收入陳邦彥選編，《康熙御定歷代題畫詩》，下卷，頁179。

55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75，頁19b-20a。

56 見楊士奇，《東里集》，詩集卷2，頁29b；王紱，《友石先生詩集》，卷3，頁11a；王偁，《虛舟集》，卷4，頁13b；王燧，《青城山人詩集》，卷8，頁2a。

57 如楊士奇，《東里集》，詩集卷2，〈趙彥如輓詩二首〉，頁29b。

58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0，頁256。

另一方面，它畢竟是一種較文官地位地下的職官，而醫術也一直沒有擺脫「小道」與「賤工」的社會形象。⁵⁹這種固化的認識也是沈德符、顧起元之評價的基點。但若將視角移至蔣、趙二人生活的時代，這種認識恐怕並非恰當。在其鮮活的生活場景中，他們與士人之交遊、唱酬，經營人脈獲取聲名，則遠非其醫者身分可以限定的。他們雖然未在官職上擺脫醫官的身分，但在士人社會交往中，其文才、儒行或政治才能業已獲得認可，並被視為士人之一員。至於其醫術所扮演的角色僅為點綴，並非關鍵。這在醫者的形象中或許屬於另類，但縱觀明初的醫官，這種現象十分普遍。

趙友同曾為戴良(1317-1383)撰寫墓誌銘。戴良，字叔能，為元末明初一代名儒。趙友同在墓誌銘記述戴良故去後二十八年，其次子來訪請銘，說道：「子於先君為內侄，又嘗有師弟子之分。」可知趙友同與戴良既為叔侄，又為師徒，關係非同一般。⁶⁰戴良之兄戴垚(1307-1349)，字仲積，其子即為戴思恭。⁶¹而戴思恭於蔣用文有知遇之恩。如此又可見蔣、趙二人的另一層關係網。此二人不僅在中國醫學史的地位與知

⁵⁹ 當然，「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說法很可能並非出自范仲淹(989-1052)之口，而只是後人的偽託，但畢竟自這一話語出現後便已深深地和范仲淹聯繫在一起。也已有研究指出，這一話語對傳統時期醫者地位的影響十分有限，更反映了醫者地位難以提升的窘境，強化了醫作為儒之附庸的認識。參見余新忠，〈「良醫良相」說源流考論——兼論宋至清醫生的社會地位〉，頁 120-131。

⁶⁰ 趙友同，〈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收入戴良，《九靈山房集》，卷 30，頁 5a-7b。

⁶¹ 我將戴思恭之父稱為戴垚，而非通常使用的戴士垚，因為在時人的記述中，除了宋濂的記述其名為「士垚」，其他人皆稱戴思恭之父「諱垚」。這兩種說法都沒有錯，在戴氏宗譜中，戴良亦名為「戴士良」，「士」代表其家族輩分，但並不一定會出現在平時的稱呼之中。沒有人稱戴良為「戴士良」，其兄戴垚很可能亦是如此。

名度皆不及戴思恭，以當時的地位而言亦不能及。自戴思恭始，明初許多宮廷醫官皆聲名卓著，但蔣、趙二人卻不耀眼，畢竟他們在生前從未擔任醫官的最高職位太醫院使。明初太醫院是個名醫雲集之地，蔣、趙不僅聲名、地位處於中游，從其任職時間而論，也約略處在這一時期的中點。讓我們的目光再次審視二人生活的年代，並略向前後延伸，以期理解當時的太醫院與宮廷醫官，故事就從戴思恭開始。

三、「儒醫」理想——戴思恭與明初宮廷醫官的轉型

明初第一名醫，非戴思恭莫屬。戴思恭，字原禮（一作元禮），號肅齋，與明初諸多名士一樣，廣為人熟知的是他的字而非名。李濂(1488-1566)曾在其《醫史》中作《戴原禮補傳》，給予其極高的評價：「原禮乃其(朱震亨)高第弟子也，篤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聲聞四馳，大顯其術於本朝，哀然為名醫稱首。」⁶²

戴思恭其家為浦江望族，自其曾祖戴濤至其父戴垚「皆隱德弗耀，詩禮相傳」。而戴思恭也自幼「讀書明大義，穎悟絕人」，其詩文之風，不尚辭藻之華麗，而求有用於時。此外，他亦旁通天文星曆、堪輿、相術，儼然一副儒者世家風範。其父戴垚雖無戴良之文采，卻也「自幼知讀書，喜作唐古體詩，工晉楷書法，至於陰陽家卜宅、相墓之術，亦往往精到」。後其母久病，醫者屢治不效，遇朱震亨方知前醫誤投藥餌，其母最終醫治無效逝世。悲痛之餘，戴垚立志學醫，苦讀醫書，並師從朱震亨，不過數年，其醫名便已傳遍吳越間。⁶³戴思恭亦隨父受業於朱震亨，朱震亨喜其穎悟異常，傾心相授。丹溪門人之

⁶² 李濂，《醫史》，卷7，頁15b。

⁶³ 宋濂，《文憲集》，卷32，〈戴仲積墓誌銘〉，頁50b-53a。

中，唯有戴氏父子最得其傳。戴垕早逝，而戴思恭則名揚江浙一帶。

其師朱震亨，字彥修，婺州義烏人，時人尊稱為丹溪翁。早年師從名儒許謙(1269-1337)，而得朱子道學之傳。他亦粗習醫術，因母病而專攻於醫，曾對其師許謙說：「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當時時方盛行，朱震亨對此頗感疑慮，遂四方遊學，終拜入劉完素傳人羅知悌(1243-1327)門下，盡得其傳，並旁通張從正(1156-1228)、李杲(1180-1251)諸家之言。⁶⁴他以醫術聞名一時，卻自任為儒者，其友人宋濂撰寫之墓表，記述其生平事跡，儒行與醫道各占其半。⁶⁵元末明初之名士多與他交往，而明初之名醫也多授業於丹溪，欲觀明代之醫學傳承，此人絕不可忽略。⁶⁶

戴思恭即為明初丹溪傳人中最重要的一個，李濂評價：「後之人能知丹溪之學者，皆公(戴思恭)有以倡啟之也。」⁶⁷丹溪之學，宗《內經》而糾宋以來拘泥成方之弊，戴思恭亦承其緒，以醫學為儒者格物致知之一端。也正因其不遵古方，洪武七年(1374)被薦舉時未能入朝為官，於是歸而還家。⁶⁸當時戴思恭已名揚京師，薦紳之家多賦詩送他

⁶⁴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 10，〈丹溪翁傳〉，頁 6b-7a。

⁶⁵ 宋濂，《文憲集》，卷 24，〈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辭〉，頁 60a-71b。

⁶⁶ 關於朱震亨生活的時代背景、醫學傳承以及他的兩篇重要傳記所呈現出的「儒醫」形象，可參考 Charlotte Furth, "The Physician as Philosopher of the Way: Zhu Zhenheng (1282-1358)," pp. 423-459. 雖然其中有一些小錯誤，比如將丹溪誤為朱震亨之字，將戴士垕誤為戴士世，但其論點頗有可取之處。

⁶⁷ 李濂，《醫史》，卷 7，頁 15a。

⁶⁸ 鄭沂，〈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顯一府君行狀〉，見於《浦陽建溪戴氏宗譜》，錄文收入毛培鎬、田渭法、徐榮華，〈戴思恭史料新發現〉，頁 222-224。戴思恭此時被舉薦而至京師並非偶然，洪武六年(1373)，太祖下詔：「山林之士，德行文藝可稱者，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見張廷玉等，《明史》，卷 71，〈選舉志三〉，頁 1712。陳漢雄在其《戴思恭年譜》中很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參見陳漢雄，《戴思恭年譜》，頁 159。

東還浦陽，而宋濂為之做序，稱有人薦其為醫官，而他「辭不就」，或為隱諱之辭。⁶⁹洪武十九年(1386)，燕王朱棣病瘕，因大臣推薦，召戴思恭前來診治。燕王病癒後重賞戴思恭，召其子戴伯兼至藩邸，並選拔袁寶(1363-1424)、王彬隨從戴思恭學醫，後來袁寶官至太醫院判，王彬官至南京太醫院判。⁷⁰洪武二十五年(1392)，懿文太子(1355-1392)病重，太祖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在位)召天下名醫為之診治，唯戴思恭直言其不可治。⁷¹太祖欲使其掌太醫院事，戴思恭以年老多病而推辭，遂改授御醫。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病逝，建文帝(1377-?)即位，遵太祖遺言，未加罪戴思恭，反而升其為太醫院使。⁷²戴思恭因年老多次請辭，終於永樂二年(1404)致仕。次年(1405)四月，成祖復召其至京相見，十月戴思恭請辭歸家，並與皇帝約定：「臣回不死，新春朝拜聖顏。」不意此竟成君臣二人最後訣別。戴思恭歸家後，祭祀家廟，召告子孫勿忘皇恩。他或許已預見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尚念念不忘恩師，計畫前去拜掃，並想逐一拜訪鄉里故舊。然而返家十數日後，他便一病不起，不久與世長辭。公卿大臣、鄉里故舊紛紛前來送終，成

⁶⁹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22，〈送戴原禮還浦陽序〉，頁1a。

⁷⁰ 孫繼宗、陳文等纂修，《明英宗實錄》，卷180，正統八年九月甲子，頁4b-5a。

⁷¹ 曹昌，〈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戴顯一府君墓誌銘〉，頁142-143。該文轉引自《戴原禮醫論》，此書未標明墓誌銘原出處，查其前言，表述雖不明確，但其意似為曹昌墓誌銘及前引鄭沂所撰行狀皆出自《浦陽建溪戴氏宗譜》，筆者未見原宗譜，無法查證。另據《戴思恭年譜》記洪武二十五年事，引《宗譜》，其引文與曹昌墓誌銘相關部分除最前兩字外，完全相同，而最前二字曹文為「壬申」，陳引為「是年」，很可能是陳漢雄已在之前表明年份與干支，為避免重複而逕改。參見陳漢雄，《戴思恭年譜》，頁162。因而此墓誌銘很可能源出《宗譜》，但不知毛培鎬等人據此宗譜發表《戴思恭史料新發現》時為何不將此片墓誌銘刊出。

⁷² 王汝玉，〈故奉政大夫太醫院使戴公墓誌銘〉，收入焦竑，《國朝獻徵錄》，卷78，頁5a-8b。此墓誌為王汝玉據鄭沂行狀而做，但此段敘事較行狀更為清晰。

祖亦遣官致祭，親撰祭文。⁷³

戴思恭生前身後皆名揚天下，「識與不識，皆曰太醫院使戴原禮」。曹昌為戴思恭撰寫墓誌銘，開篇便提出問題：「戴公名傳天下久矣，奚待余言？」繼而自己回答道：「然公平生有過人者，天下未必盡知，是不可以無述也。」至於天下未必盡知的過人之處，曹昌在文末給出了答案，這便是他為何在二十餘年間深受皇帝無以復加之恩寵：「其出處進退，從容中道，是非講學精熟所致，能若是乎？」⁷⁴然而，他在醫學史上的地位，卻難與其身前之聲名相符，一方面因為明清時代向來被視為醫學理論的「孱守」時期，除了西方醫學之傳入以及明末興起的溫病學派，其他方面實在乏善可陳；另一方面，戴思恭一般被作為丹溪學派傳人看待，其作品多承自其師，少有發明。⁷⁵然而他進入太醫院，卻標誌著明代太醫院的重要轉折：明初太醫院逐步展開的儒醫理想與實踐。

洪武年間重要的太醫院醫官事蹟可考者很少。朱元璋政權最初仿元制設醫學提舉司，後改為太醫監，以孫守真為少監，葛景山為監丞。⁷⁶吳元年(1367)，改太醫監為太醫院，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而孫守真和葛景山分別改任院使與同知，另有陸惟恭、杜天禧為院判。⁷⁷此四人僅於史籍中留名，出身、事跡幾乎無跡可尋。洪武四年(1371)，很可能因為孫守真去世，葛景山升任太醫院使。⁷⁸陸惟恭，當塗人，至正十五年(1355)為朱元璋治癒疾患

⁷³ 鄭沂，〈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顯一府君行狀〉，頁 222-224。

⁷⁴ 曹昌，〈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戴顯一府君墓誌銘〉，頁 142-143。

⁷⁵ 傳統醫史學界對明清醫學發展的評價，可參見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頁 196-197。

⁷⁶ 夏原吉、胡廣等纂修，《明太祖實錄》，卷 20，丙午年六月壬子朔，頁 7a。

⁷⁷ 夏原吉、胡廣等纂修，《明太祖實錄》，卷 25，吳元年九月癸巳，頁 6b-7a。

⁷⁸ 夏原吉、胡廣等纂修，《明太祖實錄》，卷 62，洪武四年三月癸卯，頁 2b。

而得官。⁷⁹與之經歷類似的是郝致才，他與朱元璋為同鄉，當時朱元璋尚為布衣，郝致才曾為其療病，朱元璋登大位後便召至京師，任太醫院判。洪武十二年(1379)，院使葛景山、院判郝致才、鄭德皆因年老而乞歸，郝致才之子郝文傑任太醫院使，葛景山之子葛允謙與鄭德之子分別升任太醫院判。朱元璋發誥文稱：「歷代設醫官，而不世其職，唯能者命之。前太醫院判郝致才，事朕十載而年齒益邁，已敕令致仕爾。文傑為其嗣子，善繼其學，特命為保冲大夫、太醫院使，尚其益精素業，以世厥家。」⁸⁰另外，太醫院尚有劉、李二人，因正居壯年，尚不需以子代之。而林、陳兩位年老的醫官，因無深功，亦不以子代之。⁸¹雖然朱元璋強調醫官「唯能者命之」，但實際上多子承父業，醫官如侍疾病有功，年老致仕後便可以子代之。

太醫院制度自洪武定制後，在明初幾乎沒有修改。而改變的則是太醫院醫官這一群體，戴思恭給太醫院帶來的，不僅僅是遵《內經》、不拘成方的丹溪醫學，更是朱震亨所代表的儒醫理想與實踐。戴思恭的儒醫性格，既因其家學，又承繼自其師朱震亨。李濂為其作傳，開篇便評價道：「(戴思恭)家世儒業，究心醫術，而志在澤物。」⁸²宋濂也說戴思恭「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⁸³朱震亨亦對此徒弟寄予厚望，在從師學習的三十餘年間，「其於講學切問，皆聖賢宏奧，醫特一事耳」。⁸⁴當然，僅戴思恭一人的儒醫性格，難以證明太醫院醫官群體的轉變。更為重要的是，他醫術的傳人後來得

此處原文為「葛景先」，應為葛景山之誤。

⁷⁹ 林鉞、鄒壁等纂修，(嘉靖)《重修太平府志》，卷8，頁5a-5b。

⁸⁰ 夏原吉、胡廣等纂修，《明太祖實錄》，卷122，洪武十二年二月辛亥，頁5a。

⁸¹ 朱元璋，《明太祖文集》，頁118-119。

⁸² 李濂，《醫史》，卷7，頁13a-13b。

⁸³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22，〈送戴原禮還浦陽序〉，頁1a。

⁸⁴ 鄭沂，〈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顯一府君行狀〉，頁223。

以進入太醫院，且他在任上賞識、提拔與薦舉的人才，都繼續在太醫院官居要職，使他的儒醫理想與實踐，得以在他身後傳承與延續。

（一）蔣用文及其後輩的人際網

徐春甫(1520-1596)在《古今醫統大全》裡記錄了一則戴思恭的軼事：

戴原禮，丹溪弟子，博學精醫。洪武中征為太醫院使，眼界無人，及薦蔣用文入院，會談，大喜曰：「吾儒而為醫，茲來共昌吾道，乃國家民命之大幸也。」⁸⁵

這則軼事有據可證，因為與蔣用文同朝為官的陳繼(1370-1434)為其作傳，亦引用了同樣的故事。⁸⁶戴思恭的斷言沒有錯，此後蔣用文及其後輩確實成為了太醫院中儒醫理想最重要的實踐者。

蔣用文的例子已在上一節詳細討論，他的四個兒子皆承繼其父之風而名重一時。長子蔣主善承其父業，精於脈藥，仁宗曾讚揚道：「卿有子矣！」蔣用文去世後，蔣主善被任命為太醫院判，後亦加官至太醫院使。蔣用文曾教導他：「人非學則道不明，故學貴博。既博，貴知要，夫德有吉有凶，必主於善，乃恒吉也。」這也是「主善」之名的用意所在。蔣主善亦恪守父親遺訓，為學「博而求之，約而會之」，並取《尚書》「咸有一德」篇之意以自勵，名其書齋曰「克一齋」。⁸⁷蔣主善並沒有繼承他父親的詩才，因而與士人唱酬不多，留下的相關詩作也很有限。不過有其父親在朝中的人脈，他也得以與楊士奇、楊榮、王直(1379-1462)等人交好，曾請他們為其父撰寫墓誌銘、輓詩序以及御

⁸⁵ 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卷1，頁38。

⁸⁶ 陳繼，〈蔣用文傳〉，頁16b-17a。

⁸⁷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2，〈克一齋記〉，頁9b。

賜誥文之題辭，他們亦曾為蔣主善書齋「克一齋」作序。雖然對蔣主善的評價並沒有如蔣用文那般明確地被稱為「儒醫」，但從其為學的態度以及對儒家典籍的掌握程度，通習儒術是不言而喻的；並且在眾人的贊詞中，都眾口一詞地宣稱蔣主善承繼其父之志業與德行。楊士奇總結道：「其父靜學先生以儒醫起家，仕於朝幾三十年，沒贈太醫院使，賜諡恭靖。古稱是父是子，吾於蔣氏見之。」⁸⁸王直回憶侍奉仁宗皇帝於東宮時，蔣用文「朝夕侍左右，深見禮遇，蓋有從容規諷之意，不特醫也。當是時名重諸公間，可謂古之君子矣」，而後則與其子蔣主善交往，「深歎其有恭靖之行」。⁸⁹

而王直在過訪蔣主善時，見到了其弟蔣主敬，稱讚他頗有父兄之風。主敬之名，合君子修身之要。他並沒有入仕，而是在家鄉「讀書修行，業醫濟人」。當時的御醫張敬、曾晟、何永慶、施昌宗等人皆重其為人。⁹⁰蔣用文第三子蔣主孝(1397-1472)，號樵林居士，醫術精湛，且博通儒書，因《內經》辭理古奧，而疏解其意，以示當世學者。業醫之餘，他亦性嗜吟詠，與「景泰十才子」之中的蘇平、沈愚、劉溥、王淮及其弟蔣主忠結為詩社，著有《務本詩集》、《樵林摘稿》。⁹¹其幼弟蔣主忠顯然比他更具詩才，「為詩文得古法」，並得以躋身「十才子」之列。⁹²有趣的是，此四子由長及少，興趣由醫漸儒，而且除長兄蔣主善外，皆未入仕途，主敬、主孝、主忠三人雖皆可稱「儒醫」，但皆未任職太醫院，不過與他們交遊之人中，並不乏太醫院的醫官。其中，劉溥雖稱得上正統、景泰兩朝太醫院中「儒醫」的最佳代表，

⁸⁸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2，〈克一齋記〉，頁11a。

⁸⁹ 王直，《抑菴文集》，後集卷9，〈贈蔣主敬序〉，頁12a-12b。

⁹⁰ 王直，《抑菴文集》，後集卷9，〈贈蔣主敬序〉，頁12a-12b。

⁹¹ 倪謙，《倪文僖集》，卷29，〈蔣務本先生墓誌銘〉，頁10a-11b。

⁹² 陳鏞，〈蔣恭靖別傳〉，頁14b-15b。

但畢竟官職低微。至於和蔣主敬交好之張敬、何永慶皆在景泰年間升任太醫院判。⁹³

蔣用文在病危之時，向太子、後來的仁宗皇帝推薦了醫士沈玄。仁宗即位後，即擢升沈玄為御醫。沈玄，字以潛，其先世在宋、元皆為醫官。沈玄得家傳，通貫《素問》、《難經》及張仲景(150-219)之書，明代張元素(1151-1234)、李杲等諸家要旨，「審求病源，隨證用藥，用之必效」，這點又和當時拘泥成方的世醫不同。⁹⁴而沈玄也被吳寬讚為「以文學之良，傳醫術之妙」的儒醫。⁹⁵他「工詩好琴」，留有《潛齋集》一部。⁹⁶無論出身、性格、志向與文才，沈玄皆與蔣用文頗為相同，無怪乎蔣用文臨死推薦他以自代。仁宗也曾讚歎道：「用文真知人，以潛真不負用文舉！」⁹⁷蔣主善如同其父，也向明宣宗(朱瞻基，1399-1435，1425-1435在位)推薦過一位世代在江南行醫的醫者許敬。許敬後來治癒了英宗的喉風而擢升御醫。其父許景芳與戴思恭交好，曾獲戴思恭推薦，於永樂年間擔任梁王府良醫正。⁹⁸

此外，與蔣用文素來交好的楊士奇曾患背疽，則因蔣用文推薦而結識太醫院醫士何淵(1372-1432)。何淵，字彥澄(或彥激)，鎮江人。其先世業儒，後改而從醫，以儒醫聞名。⁹⁹何淵亦承祖業，為醫不專擅一科，「一心以惠濟世為務」，「其心仁，其術精」，「賢士君子，多樂與

93 孫繼宗、陳文等纂修，《明英宗實錄》，卷 195，景泰元年八月丙戌，頁 10a；

孫繼宗、陳文等纂修，《明英宗實錄》，卷 214，景泰三年三月庚戌，頁 7a。

94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 36，〈太醫院御醫沈君墓誌銘〉，頁 29b。

95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 41，〈潛齋詩集序〉，頁 6a。

96 林世遠、王鏊等纂修，(正德)《姑蘇志》，卷 56，頁 12a。

97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 36，〈太醫院御醫沈君墓誌銘〉，頁 28a。

98 羅烱、黃承晃等纂修，(崇禎)《嘉興縣志》，卷 16，頁 7b-8a。

99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 29，〈何子玉合葬墓表〉，頁 23b。

交」。¹⁰⁰對他來說，醫術也是實踐儒者仁心與「道」的手段，王直曾為其藥室「皆春堂」做詩序，稱他「古之君子，得位以行道，推功用之極……其或未得位而思有以及人，則往往用心於醫，醫之道行，使人皆熙然相安於仁壽之中……斯亦無愧於天矣」。¹⁰¹他在永樂中被徵入太醫院，並在東宮侍奉尚為太子的仁宗皇帝，「仁宗皇帝最信任之，凡用藥御批付彥澈，彥澈進藥必收奇效，由是寵遇日隆」。如此地位，甚至堪比蔣用文。無論京師貴人或閭閻細民，多赴其門求治。¹⁰²仁宗即位後，屢次欲授官職，但皆未能實現。他也和蔣用文一樣，曾獲仁宗皇帝多次親筆賜書，且極為珍重。只是仁宗在位不及一年，還沒來得及封賞他便龍馭歸天。何淵後於宣宗宣德七年(1432)去世，雖然其一生只是個不入流的醫士，但名重於公卿士大夫間，生前與楊士奇、王直、梁潛等朝臣交好並得贈序；身後學士士大夫又紛紛為其做哀輓詩文。而在太醫院，也是「院使以下咸重之」。¹⁰³

言至此，不禁要問，當時的太醫院使是誰？蔣用文一系對儒醫理想的傳承是最具文人化的，不過其仕宦漸漸式微，而太醫院高層的情形又如何呢？何淵在太醫院任職二十餘年，可能經歷了韓奭(?-1411)、陳克恭、徐叔拱三位院使的任期。這三位院使中，徐叔拱晉升於仁宗朝，而前兩位則是明成祖尚為燕王時的藩邸醫官，他們侍朱棣於藩邸時，亦深受戴思恭的影響。

100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 19，〈故太醫士何彥澄墓誌銘〉，頁 19a；王直，《抑菴文集》，後集卷 14，〈何彥澈挽詩序〉，頁 7b；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 29，〈何子玉合葬墓表〉，頁 23a。

101 王直，《抑菴文集》，後集卷 16，〈皆春堂詩序〉，頁 13a-13b。

102 王直，《抑菴文集》，後集卷 14，〈何彥澈挽詩序〉，頁 7b。

103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 19，〈故太醫士何彥澄墓誌銘〉，頁 19b。

(二) 明成祖的藩邸醫官

蘇州世醫韓氏一族，向來與戴思恭交好，韓奕(1334-1406)聽聞戴思恭去世，曾做輓詩致哀。¹⁰⁴

韓奕，字公望，號蒙庵，其父韓凝(1318-1371)亦為吳中名醫。韓奕「自幼穎悟，讀書務窮闡奧，年十五，為詩文已純雅可觀」。早年，他曾習舉子業，不久便放棄，繼而潛心於性理之學。後因其父之命，冒兵革而遊學於朱震亨門人之間，盡得朱氏一脈之傳，醫名傳揚天下。他繼承其父遺風，隱居不出，盡以其醫術授諸弟。¹⁰⁵由於他在三十幾歲時患眼疾，因而淡泊明志，不喜交遊。雖然因眼疾不宜出外，但他說：「祖宗之術不可絕也，養祭之道不可荒也，吾唯藉吾藥以自謀而已。」¹⁰⁶

韓氏「祖宗之術」當然未曾斷絕，反而在韓奕一輩發揚光大。他的堂弟韓奭，亦即韓凝弟韓沖之子，成了他們家族最顯赫的人物。韓奭，字公茂，以其字聞名於世。他承繼家學，精通醫理，其醫術很可能學自伯父韓凝及堂兄韓奕，在蘇州一帶醫名頗盛：

吳為東南一都會，挾藝術以遊揚茲郡者不少，而醫其尤也。然數醫指必首屈於公茂，夫以都會之地，醫復多於他藝術，而數醫必先於公茂，公茂之為醫可知已；公茂年未至耄老也，耄老者之聲多後之，夫年未耄老而耄老者之聲不先於公茂，公茂之為醫可知已。¹⁰⁷

¹⁰⁴ 韓奕，《韓山人詩續集》，卷4，〈故太醫院使肅齋先生戴公挽詩〉，頁27b。

¹⁰⁵ 趙友同，〈故韓隱士行狀〉，收入韓奕，《韓山人詩集》，附錄，頁2a-5a。

¹⁰⁶ 王彝，《王常宗集》，卷1，〈秘藥巢記〉，頁12b。

¹⁰⁷ 王行，《半軒集》，卷2，〈致聲〉，頁24a-24b。

韓奕並未如其伯父和堂兄一般隱居鄉里，他的伯樂便是戴思恭。戴思恭曾進燕王藩邸為朱棣治病，離去時推薦了韓奕。韓奕初授燕王府良醫正，朱棣即位後便升其為太醫院判，不久，戴思恭致仕，韓奕便接替他擔任太醫院使。¹⁰⁸他「為人溫純謹願，不事表暴，居職尤小心寅畏，夙夜勤勞，罔有怠忽」，¹⁰⁹亦曾數次從成祖北征。途中臣僚得疾，在他用藥治療後皆能痊癒，「每行間輒隨駕，一軍皆有喜色」。他也因而與扈從北征的重臣楊榮、金幼孜交好，並在其生前身後贈文致意。¹¹⁰倒是經常贈醫官詩文的楊士奇，筆者並未見他有贈韓奕之詩文，或許這是因為楊士奇在成祖北征時，留守京都助太子監國，而未若楊榮、金幼孜二人般與韓奕交往深厚。永樂九年(1411)，韓奕去世，成祖遣官賜祭，命以三品禮葬之，並親書祭文。¹¹¹如此恩榮，堪比戴思恭，「光華寵耀，豈特一時之榮，誠足以昭示無窮，增重於先世矣」。¹¹²

韓奕在年老時推薦其堂弟韓夷(?-1417)入太醫院。韓夷，字公達，韓凝次子，韓奕幼弟。他出生不久母親便去世，當時其兄韓奕尚未有子，韓凝便託付長子韓奕，令其將幼弟作為子嗣撫養。因此，韓夷最初名為「詒孫」，長大後取字曰伯翼，「蓋欲其承隱士之志焉」。¹¹³他以「詩書之胄，克承家學」，但並未隱居，初為府醫學正科，後在堂兄韓奕的推薦下得以進京，授太醫院御醫。¹¹⁴皇帝得知他名字的來

¹⁰⁸ 焦竑，〈太醫院使韓公茂傳〉，收入焦竑，《國朝獻徵錄》，卷 78，頁 27a。

¹⁰⁹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 10，〈書御製祭韓公茂文手卷後〉，頁 8b-9a。

¹¹⁰ 楊榮，《文敏集》，卷 2，〈廣壽堂序〉，頁 1b-2a。

¹¹¹ 張輔、楊士奇等纂修，《明太宗實錄》，卷 113，永樂九年二月壬寅，頁 2b。

¹¹²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 10，〈書御製祭韓公茂文手卷後〉，頁 8b-9a。

¹¹³ 趙友同，〈故韓隱士行狀〉，頁 2a-5a。

¹¹⁴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 7，〈太醫院判韓公達挽詩序〉，頁 73a-74b；李銘皖、馮桂芬等纂修，(同治)《蘇州府志》，卷 190，頁 22a。

歷，便命賜其改名為夷，改字為公達，在形式上恢復了韓夷身為韓凝幼子的輩分。¹¹⁵韓夷去世後，韓夷升太醫院判，用藥得效。他也為韓夷之子韓傳乞恩求官，以此報堂兄薦舉之恩，韓傳最終得授御醫。永樂十一年(1413)，他亦曾扈從成祖北征。韓夷於永樂十五年(1417)去世，成祖遣官賜祭，命工部給棺，以三品禮葬，並親撰祭文。¹¹⁶

永樂朝醫官所受之恩榮，以韓氏兄弟為最。即使同為燕王藩邸醫官、並繼韓夷為院使的陳克恭亦不能及。¹¹⁷其子孫雖仕宦漸微，但皆在吳中，世守其業。作為戴思恭傳人之中官位最顯赫者，兩兄弟對太醫院的影響不言而喻。不過他們沒有蔣用文的文才，身為侍奉皇帝的主要醫官，他們的活動範圍頗為受限，交往圈亦不如蔣用文廣泛。他們的儒醫性格更多體現在其仁心與德行上，雖然史料中也偶爾提及他們習詩書，以及「儒醫」亦是韓氏家族一直以來的特點，但他們此方面的實踐並未體現於目前可見的種種生平紀錄中。

另外兩位受朱棣之命師從戴思恭學醫的燕王府良醫袁寶、王彬，關於他們的生平紀錄甚少。二人皆在永樂元年(1403)升任太醫院判，但袁寶在仁宗即位後便去世，而王彬一直在太醫院任職直至英宗朝，後被調至南京太醫院任院判。袁寶，字士珍，同蔣用文一樣，於永樂朝在東宮侍奉太子。袁寶家原隸兵籍，年輕時曾代其父從軍。後到京師充樂舞生，隨朱棣至燕王藩邸，受命跟從戴思恭學醫。「後從入金華山中，往來十餘年，遂得丹溪朱彥修之傳」。他和蔣用文一樣，因在

¹¹⁵ 趙友同，〈故韓隱士行狀〉，頁 2a-5a。

¹¹⁶ 李銘皖、馮桂芬等纂修，(同治)《蘇州府志》，卷 190，頁 22a；金幼孜，〈金文靖集〉，卷 7，〈太醫院判韓公達挽詩序〉，頁 74b；張輔、楊士奇等纂修，《明太宗實錄》，卷 195，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壬辰，頁 1b。

¹¹⁷ 筆者未能找到關於陳克恭的生平資料，其仕途升遷見張輔、楊士奇等纂修，《明太宗實錄》，卷 21，永樂元年六月乙丑，頁 7a；張輔、楊士奇等纂修，《明太宗實錄》，卷 126，永樂十三年夏四月癸卯，頁 3b。

東宮侍太子而與楊士奇交好。「一時勳臣貴戚之家有疾，率走迎之，無不效者；或貧與賤者以急告，亦趨赴，未嘗責報；而雅厚文學士，士多德之」。袁寶後蔣用文數月離世，仁宗亦給棺賜祭，追封太醫院使。當時「四方士以醫召至，隸太醫者累千人，皆能道袁、蔣之德，暨卒，皆追慕之」。蔣用文、袁寶相繼去世後，有人得難治之症，都歎息道：「袁、蔣在，吾屬不及此。」楊士奇為袁寶作墓表總結道：「蓋士珍之所可重，非獨其醫之良也。」雖然他沒有明說，但根據之前的敘述，可知袁寶之所以為時人所重者，尚有他待人接物之誠懇與德行。¹¹⁸在當時的太醫院中，由於韓氏兄弟長年隨成祖北征，而長期留在京城為太子、公卿大臣療病之太醫，多為蔣用文、袁寶二人。故韓氏兄弟在成祖朝深受皇恩眷顧；而蔣、袁二人則在朝臣中廣有聲名，並得仁宗信任與恩寵。

這一部分論及的明成祖的藩邸醫官，對於戴思恭儒醫理想傳承來說最為重要。他們多直接或間接授業於戴思恭，並在成祖朝太醫院官居顯位，對於太醫院整體的影響不言而喻。而成祖的另一位藩邸醫官劉毅，雖不如他們這麼出名，但其子在永樂朝任太醫院判，其孫即劉溥，可見儒醫理想與實踐的傳承，並不止戴思恭一系，而是那個時代的一種多元追求。以下將要講述的是戴思恭的另一系傳人，他們雖在太醫院仕宦不顯，卻是醫學史上最著名的一系。

(三) 戴思恭的醫術傳人

說到戴思恭的醫術傳人，早期在太醫院任職的有趙友同、袁寶和王彬三人。趙友同之父趙良仁師從戴思恭，而趙友同又得其傳，袁寶、

¹¹⁸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 32，〈贈太醫院使袁君墓表〉，頁 8a-10a。

王彬曾被燕王朱棣送至戴思恭處學習，在朱棣即位後得以在太醫院擔任要職。不過這三人已在前文探討，而事實上他們並非戴思恭醫術最廣為人知的傳人。李東陽(1447-1516)曾引述吳寬之語：「蘇之醫多出丹溪朱氏之門，有王仲光氏、韓復陽氏二氏之傳。」¹¹⁹雖說他們「出丹溪朱氏之門」，但他們已不能得朱震亨親自教誨，除了讀丹溪之書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師從丹溪最重要的傳人戴思恭。前文已述韓復陽(即韓凝)一系的傳承，雖說此系多仕途顯赫，但醫學史上更被提及的卻是戴思恭傳人之中，最富戲劇性的王仲光。

王賓，字仲光，號光庵，蘇州人。¹²⁰他自幼「有志周孔之道」，長大後「自唐虞三代以降，至於秦、漢、唐、宋及元，上下千百年，中間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陰陽曆數、山海圖志、兵政刑律，與夫稗官小說之書，悉覽而博記，問無有不知者」。¹²¹雖然姚廣孝說他「於醫術尤精，用藥多神效」，並且不肯為富貴人醫病，但未提及他自何處學醫。反而至明中期以後，關於王賓各種軼事的記載漸多，其中包括他盜取戴思恭醫書之事。¹²²雖然盜書之舉並不光彩，但楊循吉(1456-1544)對其歷史地位的評價很高：「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王賓此舉，成了醫學史上著名的「吳中醫派」的開端。¹²³王鏊(1450-1524)對其傳承說得更加詳細：「賓將死，以其

¹¹⁹ 李東陽，《懷麓堂集》，文稿卷 15，〈劉益齋傳〉，頁 13a。

¹²⁰ 王賓生卒年不詳，但姚廣孝在永樂七年(1409)作〈王光庵傳〉，王賓卒年應不晚於此年，又知王賓年七十而卒，則其生年不晚於 1340 年。見姚廣孝，〈王光庵傳〉，收入王賓，《光庵集》，附錄，頁 1b-3a。

¹²¹ 姚廣孝，〈王光庵傳〉頁 1b-3a。

¹²² 關於此段軼事，最詳細的記載見王鏊，《震澤紀聞》，卷上，頁 8；又見王鏊，《守溪筆記》，頁 25a-26a。兩書內容大部分重複，僅編排順序有異。

¹²³ 楊循吉，《蘇談》，頁 5-6。

書授盛啟東、韓叔暘。」¹²⁴而盛、韓二人皆曾在明初的太醫院任職。

盛寅，字啟東，蘇州吳江人，其家為當地大族，在盛寅之前，世代業儒。盛寅最初師從王賓學古文，其叔父提醒他亦要留心王賓之醫學，後得王賓之傳。他的容貌與王賓正好相反，「長髯，偉姿容」。永樂初年，他曾在縣內擔任醫學正科，後在偶然的機遇下治癒太監之疾，而為成祖所知，遂召至朝中，授御醫。¹²⁵成祖曾稱讚他為「醫流中狀元」。他不僅醫術高明，在朝中治病屢有效驗，並且「性至孝，厚倫理，言論切直，務導人以善。博及經史，長於詩」。另外，他也「達于治理」，不僅曾在醫學正科任上署理縣事，而且多次向成祖直言相諫，不肯一味迎合。其行事亦為一時之典範，例如喪禮不做佛事，居喪哀毀逾禮，以及好濟人之急。¹²⁶

如論文學造詣與名聲，盛寅絲毫不下於蔣用文，而且留下不少治病奇驗之案例。相比之下，蔣用文幾乎無醫案留存，很可能與二人治病用藥風格不同有關。蔣用文長期在宮中侍奉太子、大臣，雖然很多稱讚他醫術高明之語，但不見有奇驗之案例。這也正是為醫官侍主上之道，不求奇功，但求無過，日久必有苦勞。而從盛寅的醫案看來，他治病多不拘常規，早年王賓就曾因見他用反治法治病而驚異不已。此外，他性格直率，多直言相諫，多次惹成祖發怒，但事後成祖反而對他更加欣賞。不過並非所有人都如成祖一般寬容，仁宗為太子時，盛寅因用破血之劑治療太子妃之疾，受到猜忌。¹²⁷永樂二十二年(1424)，成祖第五次北征，盛寅曾勸皇帝年事已高，不宜遠行，但成祖並未聽

¹²⁴ 王鏊，《震澤紀聞》，卷上，頁8。

¹²⁵ 王鏊，《守溪筆記》，頁26b-28b。

¹²⁶ 錢溥，〈太醫院御醫盛寅墓表〉，收入焦竑，《國朝獻徵錄》，卷78，頁39a-41a。

¹²⁷ 王鏊，《守溪筆記》，頁27b-28a；張廷玉等，《明史》，卷299，〈方伎傳〉，頁7646-7647。

勸。¹²⁸由於盛寅深知太子即位將對自己不利，便請求歸家探望老父，並前往南京太醫院任職。後來成祖果然在這次北行途中駕崩於榆木川，然而仁宗在位後不及一年就過世，而由宣宗即位。據說先前宣宗之母難產，盛寅以針治之，雖然母親去世，但保住了皇子。¹²⁹宣宗或許因此對他心存感激，即位後問左右：「有髯善醫者為誰？今安在？」得知他在南京太醫院後，便下旨召還北京，並對他寵遇有加。¹³⁰最終，盛寅卒於英宗正統六年(1441)。其弟盛宏亦精通醫藥，官至御醫，其子孫世其業。¹³¹盛寅或許對太醫院的影響有限，但「蘇之稱儒醫曰盛氏者」，自盛寅而始。¹³²

王賓的另一位傳人韓叔暘(?-1434)，相對而言留下的生平紀錄要少得多。他和盛寅的關係很好，在王鏊記述盛寅的故事時多次出現，不過多為配角。他個性小心謹慎，不如盛寅直言敢諫，棋藝劣於盛寅，詩文亦不及。¹³³而且他在當時只是一名醫士，曾在宣宗為太子時侍於東宮，因而在宣宗即位後得授南京太醫院判。¹³⁴在他去世後，宣宗亦遣官賜祭。此外，他在士人圈的知名度也沒有如盛寅一樣地高，除了以上提及的因素，還因他的為人。自從擔任南京太醫院判，他便「怙寵驕恣，貪黷虐下，眾側目焉」。¹³⁵

至此，在明初醫官與皇帝、公卿、士人的一片和諧景象中我們聽到了一絲不同的聲音。不過韓叔暘的例子尚屬個案，並沒有扭轉整體

¹²⁸ 錢溥，〈太醫院御醫盛寅墓表〉，頁 39a-41a。

¹²⁹ 江灌，《名醫類案》，卷 12，頁 334。

¹³⁰ 王鏊，《守溪筆記》，頁 28a-28b。

¹³¹ 林世遠、王鏊等纂修，(正德)《姑蘇志》，卷 56，頁 11b。

¹³² 錢溥，〈太醫院御醫盛寅墓表〉，頁 39a。

¹³³ 王鏊，《守溪筆記》，頁 26b-28b。

¹³⁴ 張輔、楊士奇等纂修，《明宣宗實錄》，卷 2，洪熙元年六月丁巳，頁 7a。

¹³⁵ 張輔、楊士奇等纂修，《明宣宗實錄》，卷 115，宣德九年十二月辛亥，頁 4a。

的宮廷醫官形象。然而在仁宗朝之後，像明初那樣儒醫性格明顯，且與士人交往頻繁，並獲士人餽贈詩文的宮廷醫官漸少，除了劉溥很難再找出另一位，不過至少這一群體尚少有惡名。直至憲宗朝，宮廷醫官在朝中文臣眼裡的形象才急轉直下。

四、吳中高士——隱逸與聲名的辯證

讓我們將目光再次轉回劉溥的時代。與劉溥並稱「十才子」的沈愚在某種程度上更符合陸容描述的士人形象。在十才子中，沈愚與劉溥最為相似，二人皆以行醫為業。¹³⁶曾有人勸沈愚進入仕途，沈愚回答：「吾非籠絡中物，既不能與世軒輊，徒勞奔走，塵務耳。」最終他「斂跡不出，業醫授徒，以終其身」。¹³⁷沈愚的形象正符合以下要探討的醫者類型，兼具儒士與隱逸的性格。

這類隱逸醫者，在元末明初紛亂的政治局面中更加突出，他們不願出仕，潔身自好，隱居鄉里，以行醫賣藥為業。在文人給予他們的贈序中，東漢隱者韓伯休「逃名」的事蹟被反覆提及。¹³⁸然而正如韓伯休的例子一樣，「避名而名益顯」是普遍的現象。這也引起筆者關注「隱逸」與「聲名」這對看似矛盾，實則暗合的特點。

在此我們又在吳中遇到意外的例子。清代大儒朱彝尊(1629-1709)在其《明詩綜》總結道：

¹³⁶ 「十才子」之小傳均見張廷玉等，《明史》，卷 286·〈文苑二〉，頁 7341-7342。

其中關於蘇平、蘇正、沈愚、王淮、鄒亮、王貞慶更詳細的資訊及詩作評價可參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 7，頁 25a-29b。

¹³⁷ 方鵬，《崑山人物志》，卷 5，頁 7a-7b。

¹³⁸ 韓伯休之事蹟見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83，〈逸民列傳〉，頁 2770-2771。

明初吳中高士三人：一為長洲王賓仲光，一為崑山王履安道，其一則(韓奕)公望也。三人皆隱於醫。仲光詩多俚率；安道游華山作詩一百五十首，然無足錄者；必以公望為巨擘焉。¹³⁹

王履(字安道，1332-?)，在三人中最為年長，以醫術師承的關係來看，比其他二人長一輩分。他「篤志於學，博通群籍」，並得朱震亨之傳，他尊張仲景《傷寒論》為諸家之祖，認為後人立論不出其藩籬。¹⁴⁰他著有多部醫學作品，但僅《醫經溯洄集》存留至今。此外，他沒有如姚廣孝一樣的朋友，也沒有做太醫院使的弟弟，就當時的名氣而言，難以與王賓、韓奕相比。雖然他是三人中唯一被寫入正史之人，但筆者並未見到明初士人為其贈序、立傳或撰寫墓誌銘，其卒年至今尚難確定。¹⁴¹不過有件大事卻讓他被後世銘記。

洪武十六年(1383)秋七月，年至五十二歲的王履前往華山一遊，歸而作圖 40 幅，記 4 篇，詩 150 首。錢謙益評價他「自有華山以來，遊而能圖，圖而能記，記而能詩，窮攬太華之勝，古今一人而已」。¹⁴²雖然朱彝尊認為王履這 150 首詩「無足錄者」，但他也得到了明中後期士人的廣泛讚譽。王履的華山圖冊後歸同鄉武氏(現分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當時的士人王鏊、王世貞(1526-1590)，以及名揚一時的書畫家文徵明(1470-1559)、祝允明(1460-1527)、董其昌(1555-1636)紛紛前往鑒

¹³⁹ 朱彝尊，《明詩綜》，卷 11，頁 490。

¹⁴⁰ 林世遠、王鏊等纂修，(正德)《姑蘇志》卷 56，頁 7b-8a。

¹⁴¹ 張廷玉等，《明史》，卷 299，〈方伎傳〉，頁 7638。

¹⁴²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 100。王履游華山之時間亦本錢謙益記述。

李濂在《醫史》中為王履作補傳，稱「履元季嘗游華山」。參見李濂，《醫史》，卷 7，頁 12a-13a。另據王履《華山圖記》題識落款時間為「洪武十六年，歲次癸亥秋九月十有二日」。見朱存理撰，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卷 16，頁 14b。按王履遊華山歸而做圖，當年七月遊華山之說更為可信。

賞，並執筆題辭。王履身兼詩、書、畫三絕，這也是自蘇東坡(1037-1101)以來文人畫家的理想形象。他一反繪畫中「師古人」之風，強調師法自然，以其自身的實踐而言便是「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不過他的畫風卻承襲自以南宋馬遠、夏圭為代表的「院體」山水，而這種畫風卻是被元代以來的文人畫家所排斥的。王履身兼兩種互不相容的特點，使得他成為中國畫史中一個有趣的「意外」。¹⁴³

在王履的多重身分中，文人與畫家兩者對於藝術史研究者來說最為重要，這也使得他成為一個典型文人畫家或「業餘」畫家。而醫術在他的生活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環，一種賴以謀生的技藝。¹⁴⁴李嘉琳(Kathlyn Maureen Liscomb)則試圖找出其繪畫思想與醫學實踐之間的關聯。¹⁴⁵不過本文的關注點在於其社會身分而非思想，對於明清的士人而言，醫者才是王履多重身分中最為顯著的一個。王鏊在看到王履的《華山圖冊》之後感歎道：「始予讀《溯洄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修《蘇州志》，知其能詩，不知其又工於文，又工於畫也。」¹⁴⁶而他編纂的《姑蘇志》中，對王履的記述實際還是側重於其醫學思想。董其昌在王履畫冊的題識中也首先強調他「精於醫」，「訪藥秦中不得」之後，方才遊華山，繪圖作詩。¹⁴⁷祝允明也歎息自

¹⁴³ 關於王履畫風的探討，可參考高居翰，《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的繪畫(1366-1580)》，頁4-6；對於王履華山圖冊與繪畫思想的詳細研究，參見Kathlyn Maureen Liscomb, *Learning from Mount Hua*. 關於元代文人畫，可參考何惠鑒，〈元代文人畫序說〉，頁246-274；高居翰，《隔江山色——元代繪畫(1279-1368)》，頁1-46。

¹⁴⁴ 高居翰，《江岸送別》，頁4。

¹⁴⁵ Kathlyn Maureen Liscomb, *Learning from Mount Hua*, pp. 85-92. 李嘉琳認為，王履的醫學思想尊崇經典而又可依據自身實踐來修正既有的認識，他對於「常」與「變」的認識亦可能應用於其繪畫實踐之中。

¹⁴⁶ 王鏊，《震澤先生集》，卷35，〈書王安道登華山圖〉，頁505。

¹⁴⁷ 〈王安道蒼崖古樹〉題識，收入汪砢玉，《珊瑚網》，卷43，頁6a。

己無緣得見王履，而文士所傳述的事蹟，多從他的醫書之中推測而來。¹⁴⁸李濂在其《醫史》中為王履作補傳，自然集中於醫學方面。¹⁴⁹而清代修《明史》時，王履的傳記列於方伎，文字則與王鏊《姑蘇志》中的記載基本相同。¹⁵⁰

王履多重身分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何？張大復(1154-1630)在《吳郡人物志》中給出了一個答案。這篇傳記對王履生平的記述，醫術與詩文書畫各占其半，最後總結道：「詩文書畫，皆宇內靈氣透漏之路；而軒岐一法，可回造化。」¹⁵¹多種技藝集於一身並不矛盾，身兼醫卜星歷數技的士大夫在典籍中屢屢出現，貫通詩、書、畫三絕亦是傳統文人的理想形象。王履稍有不同，因為他的醫術與畫作太耀眼了，以至於遮蔽了史籍中對他其他方面的描述。他當然並非「醫工」或「畫工」之類的末流，因為當時界定一個身分的並非他的職業，而在其志業，亦即支撐其行為背後的理念、信念及道德性因素；當然還包括其交往圈以及聲名傳揚的群體。王履「博通群籍」、「篤志問學」，被「文人輩傳述仰重」，並得「高士」之稱，可見他在當時人的眼中是士人的一員，而非醫者。詩、文、書、畫、醫只不過是他「學術淵邃，吐露奇傑」，內在之鍾靈毓秀發之與外在的一種表現。¹⁵²「士有特絕之行，舉一該百，皆不可朽，王安道其是乎」！¹⁵³

王履確實出類拔萃，當時的吳中，「如沈貞、許律、董伯儒、許湛、陶浩、葛哲(1389-1461)、何順中、周振譽之醫，如張翬、范暹、吳

¹⁴⁸ 祝允明，《懷星堂全集》，卷 26，〈題王安道華山圖後〉，頁 10a。

¹⁴⁹ 李濂，《醫史》，卷 7，頁 12a-13a。

¹⁵⁰ 張廷玉等，《明史》，卷 299，〈方伎傳〉，頁 7638。

¹⁵¹ 張大復撰，方惟一輯，《吳郡人物志》，頁 85。

¹⁵² 祝允明，《懷星堂全集》，卷 26，〈題王安道華山圖後〉，頁 10a。

¹⁵³ 張大復，《吳郡人物志》，頁 86。

璫、李紹之畫，如支鑑、張翼、王綸、顧培、李元壽之書，各於其時而霸其曹，夫子兼之，則安道一人耳。」¹⁵⁴如僅就醫者這一身分而言，王履在吳中三高士中最為顯著。醫術之高下難以比較，不過以醫學方面的描述比例而言，王履的傳記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王履寫了多部醫學書籍，且有一部存留至今。而在王鏊《姑蘇志》中，王履列於「藝術」，而王賓與韓奕皆列於「卓行」。韓奕尤精於詩，有《韓山人詩集》傳世；王賓更以其隱逸與高行著稱於世，因《龍門春曉圖》在畫史留名，¹⁵⁵亦有《光菴集》傳世。

那麼，醫術在他們實際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呢？對於韓奕來說，「遠近求療者，戶外之履常滿」，行醫必然是他最主要的經濟來源，不過對於貧困的病人，他「輒予藥，不計其值，甚或以粟帛周之」。¹⁵⁶王賓亦「以賣藥自給」，而且姚廣孝稱讚他「用藥多神效，而未嘗肯與富貴人醫，里巷間貧人及方外士來求醫者，即趨往診視，施與藥餌，一不望其報」。¹⁵⁷至於王履，筆者並未見到任何關於他行醫的記載，大概他主要維持生計的職業是「教授鄉里」，而後人對他的瞭解也大多來自其醫書或畫作。¹⁵⁸高居翰稱王履「行醫為生」雖很難有直接的史料證據，但也是合理的推測，畢竟很難想像一位深諳醫理的士人卻不行醫。¹⁵⁹不過我們可以看出文人對醫者的贊詞總有一種道德理想化的敘述方式，那便是對貧病者的施藥與救治，唯此方能彰顯其道德與濟人之心。

154 張大復，《吳郡人物志》，頁 85-86。

155 張昶，《吳中人物志》，卷 13，頁 15b。

156 趙友同，〈故韓隱士行狀〉，頁 2a-5a。

157 楊循吉，《吳中往哲記》，卷 1，頁 5b；姚廣孝，〈王光庵傳〉，頁 1b。

158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 100。

159 高居翰，《江岸送別》，頁 4。

文人敘述中的「明初三高士」，雖各有側重，但都彰顯了他們的多重形象，最終將其整合在一起的則是他們的高士之行與隱逸之風。吳寬歸納王賓一生：

吁嗟先生，吳之隱淪！謂其拙於用，而文足以敘事；謂其絕乎俗，而術足以濟人；謂其生而迂，其智能全於世；謂其死而怪，其孝不忘乎親。蓋古所謂通儒，而又謂之獨民，吾於先生亦云。¹⁶⁰

王賓與韓奕皆「以醫浮沉於俗」，三人之中，王賓是隱逸性格最為明顯的一位。¹⁶¹他不願入仕，居住在城中一間普普通通的房子。為明其不仕之志，他甚至自毀面容，衣衫襤褸行走市間。時人見其醜惡之態紛紛避之；即使知道他博學的人，也因他醜陋而不舉薦。他平生不娶，多與方外之人交往，常閉門讀佛經。王賓好作艱深詩文，他人難以通其意。他和同里的姚廣孝與韓奕交好，二人後來皆顯貴，姚廣孝為王賓作傳，並與韓奕一同商議刊行，以傳四方。¹⁶²然而，姚廣孝助成祖靖難歸鄉後，由侍從相隨，騎馬至王賓家，王賓竟不肯相見；直至姚廣孝獨自徒步至其門下，王賓始相迎。¹⁶³醫者形象在時人的描述之中不過是隱逸形象的一種從屬，行醫只是隱逸高士踐行儒者仁心與濟世之念的一種方式，而作為謀生手段的行醫幾乎不被提及。

如果說一部分元末明初士人「隱於醫」是因為當時紛亂的政局，

¹⁶⁰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 47，〈王光庵先生遺像贊〉，頁 10a。

¹⁶¹ 劉鳳，《續吳先賢贊》，卷 12，頁 12b。

¹⁶² 姚廣孝，〈王光庵傳〉，頁 1b-3a。

¹⁶³ 黃暉，《蓬窗類記》，卷 2，頁 14b-15a。黃暉生於正統初年，卒於弘治末年，卷首有嘉靖六年(1527)王鏊序，稱黃暉為「故友」，此書或成書於正嘉之間。此書版本源流及刊刻經歷較為複雜，可參見牛建強，〈明人黃暉《蓬軒類紀》相關問題考釋〉，頁 39-47。此文認為《蓬窗類記》原名實應為《蓬軒類紀》。

那麼另一類隱逸醫者明顯有著其他傾向。何惠鑒探討過元代繪畫中「書齋山水」一類的題材，它是以畫作體現元代文人隱居樂道的理想，「書齋」成為繪畫的主要對象與題材，是文人畫家生活重心及其內心世界的反映。文人畫家將自我、生活環境與情趣融入畫作，表達了人和地、環境與心境、藝術與現實的結合。¹⁶⁴這也提示我們探尋明人對醫者贈序中的一類重要題材——書齋或藥室之題記。

韓奕於家築一室名曰「秘藥巢」，他因目疾而深居簡出，但仍心繫家族醫術之傳揚與濟世之道。他自製良藥陳列室內，垂簾而坐，病人來訪便以藥與之，病人亦以得其藥為榮。但此室對於他而言並非只是施藥之所，他曾向友人王彝(?-1374)表達室名之涵義：「吾之室，吾以為巢焉。吾野人也，宜巢。巢，野人居也。雖然以野人而居，野人之居然而在市之中，吾懼夫市之人以為吾疑也。」王彝聞言深表敬意：

君固欲以古道而淑夫市之人，緇冠深衣，不服今服，非古轍弗履，非古書弗讀，巋然為鄒魯儒者。吾方擬君若三代之民，今居曰巢，且居是，秘藥於其間，是又欲神農氏所味，以療夫鼎俎酣秦之徒，以有巢所居，而易夫雕牆峻宇之俗也。吾將賀夫市之人之日趨於古也！¹⁶⁵

韓奕返璞歸真，服尚古、書尚古、而又居尚古，不循於俗，有古儒者之風。與書齋山水有著類似的意味，王彝為秘藥巢做記，描畫鋪陳之後，著重於凸顯居住其間的隱者形象。〈秘藥巢記〉在所有醫者的書室、藥室記文中算是一個特例，它著墨於人物在其中的活動，相較通常的寫法是對書室、藥市周邊環境的描繪，對其名稱的解說，進而論及主人之生平事蹟。

¹⁶⁴ 何惠鑒，〈元代文人畫序說〉，頁 249。

¹⁶⁵ 王彝，《王常宗集》，卷 1，〈秘藥巢記〉，頁 13a-13b。

隱逸而聲名顯於當世者不乏其人。其隱逸之風，雖謂「逃名」，但皆有文人雅士樂道其事，並傳揚其隱逸之名。「仕」與「隱」本為儒者立身處世之兩種抉擇，但「隱」並非與世隔絕，僅是與出仕截然對立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們追求澹然獨居的生活，但也樂於與文人雅士交友唱酬。行醫是大多數人選擇的謀生方式，醫乃古聖濟民之一端，亦是士君子實踐儒者仁心與濟世之念的最佳方式。他們不尚世俗之名，而是追求另一層面上的傳世之名。

在這種意義上，韓奕之父韓凝便是個很好的例子。韓凝，字復陽，少孤，事母謹孝。其先人在宋代以仕宦精醫藥，遂傳其家。韓凝「力學好古，尤精醫家之說」，名重一方。吳中名士龔璠(1266-1331)、鄭元祐(1292-1364)與之交好，當「四方來者問吳中士，兩人者以君為稱首，於是人知君之於醫，蓋寓也」。在元末明初之亂世，他隱而不仕，以奉親教子為務。他曾論醫曰：「醫之為術，與儒者之學，皆出古聖人，而後世粗工皆庸妄，去聖人遠甚，以庸妄業聖人之事，又不習其書，又不資於儒，宜其失之者多矣。吾所以求賢豪之士，意必有隱者焉。」當他讀到朱震亨的《格致餘論》，其中「推本黃帝《靈樞》、《素問》以為說」，他知道自己找到了長久以來之所求。當時朱震亨已去世，他便命長子韓奕師從朱震亨的門人，雖未明言，但這位門人極有可能是戴思恭。¹⁶⁶

醫術精湛不過是韓凝諸多特徵之一。他的隱逸之風可謂明初之典範，尤其是不應張士誠(1321-1367)徵召的事蹟在明初得到諸多名臣文士

¹⁶⁶ 不過不論韓凝的墓碣，還是韓奕的行狀，皆未明言「朱震亨門人」的姓名，如果此人為戴思恭，應無須避諱，或許韓奕師從的並不止一位「朱震亨門人」。無論如何，韓氏得戴思恭之傳是很明確的。戴思恭的另一位醫術傳人王賓亦曾為韓凝撰墓誌，很可能因為他與韓凝之子韓奕交好。見王賓，《光菴集》，〈韓處士墓誌〉，頁 222。

的讚揚。元末明初名士胡翰(1307-1381)應其子韓奕之請，為韓凝做墓碣銘。¹⁶⁷此後方孝孺(1357-1402)、楊士奇覽此銘文，皆為文以贊之。其中方孝孺更是做了一番隱逸與聲名的探討：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托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為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為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眾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¹⁶⁸

方孝孺認為，能傳揚於世者，並非其「位」而在於其「道」，因而達官貴人身後聲名泯滅，而隱逸之高士，其名卻昭然如日月。胡翰之文才與高行見重於當時，因而韓凝得其文更彰顯其過人之處。在這種意義上，文人贈序也是一種聲名傳揚的機制，使隱逸賢者得名士贈文而聲名益著；而得名士之文，也是受贈者樂於向他人出示、炫耀的一種資本。

方孝孺亦提出了一種與韓凝截然相反的形象以作對比。世俗之人在親眷離世後，多謀求達官顯宦之文，以求傳揚身後之名。然而，韓

¹⁶⁷ 胡翰，《胡仲子集》，卷9，〈韓復陽墓碣〉，頁135-136。

¹⁶⁸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18，〈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頁17b-18b；另楊士奇之文見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23，頁17b-18b。

凝不也是在其子侄任太醫院堂上官之後才得以揚名公卿之間？如果胡翰未聞名於公卿之間，韓凝得其文又如何顯得如此珍貴？如果我們仔細審視「吳中三高士」的例子，王履的生涯只能透過明中後期的紀錄來重現，王賓則有友人姚廣孝作的傳記，而韓凝、韓奕則無疑有著更多明初士人與高官的贈文。我們不得不反思在隱逸醫書身上的理想化敘述，他們在明初的「隱逸」聲名，最終還是要依靠其人際網絡來傳揚，正因為韓奕、韓奕得任高位，其父兄的隱逸之名才更為時人所知。這頗為吊詭的現象也提示我們，隱逸與入仕兩種生涯並非截然對立的選擇，在當時的社會之中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反過來看，王履因其《華山圖冊》在明中後期聲名鵲起；王賓因「盜書」的橋段而被銘記為「吳中醫派」之始；韓凝、韓奕在明初之後又有誰知？這種後世之名的流傳機制，便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了。

五、餘論——吳中醫派之興起與傳衍

「吳中醫派」之始，「王賓盜書」這一戲劇化的情節過於簡化，而脫離具體歷史情境總結的社會經濟原因也稍嫌泛泛。吳以義所勾勒的朱震亨一脈之傳承，無疑塑造了吳中醫派之學統。¹⁶⁹另外，梁其姿也指出，金元以來由學者和醫者構成了醫學知識傳播之「專業網絡」。¹⁷⁰然而這一「網絡」卻絕非僅「專業」這一種面向，我們毋寧視其為一種「社會網絡」。對於學者而言，這或許是其獲得醫學知識與醫療資源的重要途徑；但對於醫者而言，其意義卻不僅只在於傳播專業知識，更是其經營人脈、傳播聲名的方式，並進一步

¹⁶⁹ 吳以義，〈溪河溯源〉，頁 57-94。

¹⁷⁰ Angela Ki-che Leung, "Medical Learn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p. 392.

塑造了這一醫者群體在當時社會中的身分與形象。

探討這個問題，文人對醫者的贈序便提供了很好的資源。自元末至明初的文集之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文人贈予醫者之序文增多。陳元朋曾經注意到了這些現象，並將其視為「士人尚醫」風氣的重要表徵。¹⁷¹實際上，這一現象遠沒有停滯在陳元朋所列的明初幾部著名文人的文集之上，而是一直延續到了明中期。我們當然不能將贈序內容簡單地視作醫者生平的記錄與評價，此種文類更多反映的是當時文人眼中的醫者，是他們對醫者理想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哪些醫者值得被記述；另一方面，則是醫者的哪些形象值得被反覆強調以為垂世之模範。以本文集中討論的明初醫者來看，在當時的文人筆下，他們無一不符合「儒」的標準。與傳統的醫家傳記不同，贈序中對於醫術的描寫僅留於泛泛的稱讚，基本見不到任何醫案性質的文字。贈序最受關注的，除了醫者的家世、師承，更是對其行為的描寫：或嗜好儒書，精於詩文；或周人之急、濟人所困；或為人雅厚，交遊廣泛；或隱居樂道、不染俗塵。

我們當然要對這類頗具同質性的文本抱持批判的眼光，其中描述的醫者生涯毋寧是一種再現而非實相，其中展現的醫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時人對於理想醫者的期待。Florence Brettelle-Establet 探討了雲南、廣西、廣東三省清代地方志中醫家傳記的寫作特色與史料價值，她指出可以透過這些傳記來分析身分認同，並理解古人對於理想醫者形象的期許。¹⁷²在另一篇分析醫書序言文本的文章中，她也指出序言作者對於儒醫形象的塑造。¹⁷³就內容而言，本文所探討的贈序與

¹⁷¹ 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頁 240。

¹⁷² Florence Brettelle-Establet, "Chinese Biographies of Experts in Medicine: What Uses Can We Make of Them," pp. 421-451.

¹⁷³ Florence Brettelle-Estable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dical Writer's

醫家傳記相似，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對醫者生平的再現；從作者與文本功用來看，贈序又與醫書序言有異曲同工之處，它們大都由與醫者熟識的文人所作，並可傳揚醫書／醫者之聲名。然而贈序亦有其獨特之處，其在另一層面提供了醫、士交往的證據。¹⁷⁴祝平一通過對「醫史」文本的分析，探討醫者的群體認同與身分焦慮，指出他們比附「儒」的策略實際反映了醫者難以向上提升的社會窘境。¹⁷⁵不過，除了話語建構，我們還可透過贈序文本探討醫者努力向上提升的社會策略。「儒醫」除了是一種形象建構，更是元明之際醫者真實的社會實踐。一方面，不同於醫史文本中對於醫學譜系的建構，元明之際的醫者有著明確可以追溯的真實譜系，醫學知識與儒醫性格在這條譜系中延續不斷；另一方面，他們運用自身的儒者性格、文學才能以及醫學知識，在士人與顯宦之間經營自身的人際網絡，並獲得他們的認可、友誼與尊重，以獲取官職或傳揚賢名。誠然醫者較低的社會地位未能改變，但本文所探討的這群人，其身分邊界十分模糊，我們難以將他們定義為單純的醫者、儒士、畫士或隱士，他們的身分不斷游移，並在社會交往之中重新界定。如果說醫者面臨難以向上提升的社會窘境，那本文所探討的這一群人無疑在這方面更進了一步。

這類具有極強儒者性格的醫者在明初的普遍出現，自然與兩宋以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rough Authorial and Allographic Prefaces,” pp. 249-390.

¹⁷⁴ 誠然，本文對作為形象建構的贈序文本分析稍嫌不足。在所有元末至明中期的醫者贈序之中，贈予明初吳中醫者的序言只占較少的一部分。如要了解贈序總體的特色與其中醫者的多元形象，仍需廣泛選取樣本做深入的文本分析，此非本文能夠處理的問題。作為所有贈序中最具連續性和整體性的吳中醫者贈序，本文的探討著重在其呈現的「儒醫」形象以及作為社會交往證據的特色。

¹⁷⁵ 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頁 401-449。

來「儒醫」理想與實踐的傳承息息相關，但仍需更進一步將其置於元明易代之際的歷史情境中加以考察。¹⁷⁶元末以來，吳中文人、醫者、書畫之士的聚集十分引人注目。這種現象並非偶然，實則是在元代政治、經濟與文化政策的擠壓之下產生的。元末江南富庶，經濟、文化無疑領先於北方。「元之季吳中多富士，以奢侈相高」，而多「好文而喜客」。¹⁷⁷不過南方的士人一方面處於元代「四等人」劃分的最底層，另一方面由於科舉的廢除失去了入仕之途。他們或隱居不仕，研習並實踐宋代以來的理學思想，優遊於士人之間，書畫創作、詩文唱酬不絕。¹⁷⁸另一部分士人選擇其他職業以維持生計，在范仲淹「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激勵下，醫學便成了一種最為普遍的選擇。¹⁷⁹張士誠據吳之時，對文人的籠絡也對讓吳中文人盛極一時。但隨著大明王朝的建立，朱元璋對吳中文人與士族的打擊也讓隱逸的理想繼續延續了下去，所謂明初「吳中三高士」便是其中的代表。不過在明初吳中文脈衰落的同時，醫術之傳承並未斷裂。雖然元明之際最具代表性

¹⁷⁶ 元明易代史的研究，如與明清鼎革與晚清民國的近代變革比起來，相關的研究討論要少得多。不過與所有易代史一樣，政權更迭時的認同問題頗值得探討，尤其是涉及到非漢族政權時，問題便更為複雜。元明易代當中最高興的課題便是江南士人對元朝這一異族政權的懷念，最為經典性的研究當屬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頁 1-85。

¹⁷⁷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 51，〈跋桃源雅集記〉，頁 4a。

¹⁷⁸ 何惠鑒，〈元代文人畫序說〉，頁 251。

¹⁷⁹ 韓明士以江西撫州一地的士人為例，考察了宋元兩代士人的職業選擇，並從多種角度提出對士人從醫現象的解釋。見 Robert P. Hymes, "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s in Sung and Yuan," pp. 9-76. 韓明士認為「士人為醫」現象從元代開始，陳元朋對此提出異議，並對韓明士迴避「儒醫」這一關鍵論題提出批評。參見陳元朋，〈宋代的儒醫——兼評 Robert P. Hymes 有關宋元醫者地位的論點〉，頁 179-202；以及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頁 31-33。

的葛氏世醫家族至明代聲名漸衰，但更多的士人在仕途不暢的情形下選擇以醫為業，並在家族之中傳承了下去。另外，最為重要的是，吳中的醫者不但未如文人一般遭受打擊，反而有一大批人進入了太醫院。以戴思恭為開端，以韓氏一族為頂峰，吳中的醫者漸漸在太醫院佔據顯位，當明中期的吳寬談起吳中醫者之盛時，他說：

蓋今世言醫之盛者，必及吾蘇，宜其有人而皆表然以見於時也。世遠者不及知，而未仕者不暇論，自永樂以來，若韓氏曰公達、公茂，盛氏曰叔大、啟東，劉氏曰原博、宗序，至沈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劉德美、周原已相繼而出，多以儒醫稱，非尋常俗工。¹⁸⁰

吳中醫者為何能在太醫院中勝出，尤其是在重用北人的明成祖朝逐漸佔據太醫院的高位？醫術自然是重要的方面，但筆者在此尋求的是另一層面的解釋。朝廷選任醫官，看重的自然是醫術而非出身，但太醫院一時之風氣自然可影響到醫官的選任。戴思恭初次被薦舉而未得選入太醫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尊《內經》、斥成方的醫學思想與當時的太醫院醫療風氣不符。戴思恭治癒明成祖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二人建立起的私人關係使得戴思恭在永樂朝得以執掌太醫院，進而帶來尊《內經》之醫學風氣的同時，也將儒醫理想在太醫院內不斷傳衍。明初薦舉、徵召之醫官尤多，他們或得到太醫院高官的賞識，獲得提拔；或在東宮侍奉太子，新皇帝即位便榮登顯位。由此，在戴思恭之後，永樂朝太醫院形成了第一代吳中醫者掌權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韓氏兄弟以及蔣用文皆為戴思恭推薦並提拔之人。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吳中醫者在後世的存續，吳中醫者漸漸積累下來的「文化資本」也讓他們更容易得到賞識：首先，太醫院醫官的子嗣多承繼父業，或得父

180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 74，〈明故太醫院判陳君公尚墓表〉，頁 12b。

之恩蔭得到重用。其次，這一代的吳中醫官多為儒醫，並有著較好的文學才能，與朝中重臣多有交好，這種文臣與醫官的良好互動在其身後並未斷絕。再次，吳中醫者世代傳衍的丹溪醫學與儒醫理想，正符合太醫院一時之風氣。最後，太醫院堂上官由吳中醫者把持的局面，也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壟斷了相關的教育與晉升的資源，醫者之間人際網也讓相互之欣賞與薦舉成為一時之風氣。

吳中醫者在明清時代之盛十分引人注目，筆者希望通過考察其初興時代重要醫者的生涯模式，來探尋其興起的時代脈絡。張哲嘉在探討明清江南醫學集團時，希望在醫學中的地域概念上邁出細部研究的第一步。¹⁸¹本文所處理的，無疑是更加細節性的問題，但似乎不應把關注點僅僅囿於醫學史之中。就本文涉及此一已被前人充分探討的領域，如果能為宋元明過渡增添一註腳，為元明易代江南士人的命運增添新的思考方向，為醫者研究增添一個另類的問題意識，便是我最初的目標所在。¹⁸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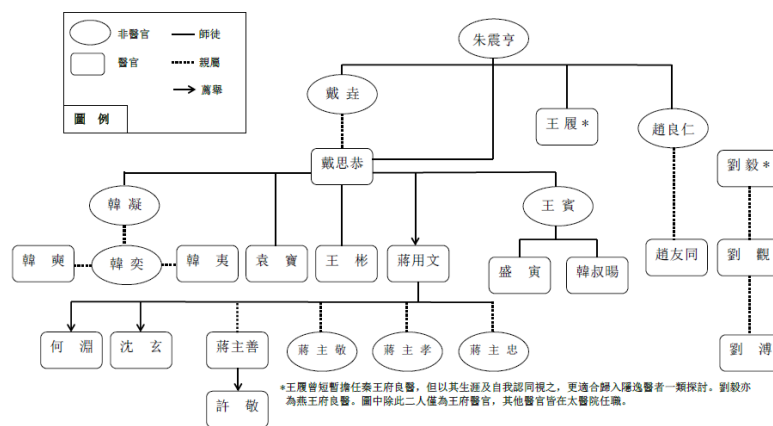
(本文於 2014 年 9 月 26 日收稿；2015 年 2 月 2 日通過刊登)

*本文初稿曾得業師余新忠的悉心指教，常建華、張傳勇等諸位師長的指點，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指正，在此謹致謝忱。文中一切舛誤與疏漏之處，均由本人負責。

181 張哲嘉，〈明清江南的醫學集團〉，頁 256。

182 宋元明過渡說首先由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一書提出，近年來關於這一問題的學術爭論的回顧，參見李新峰，〈論元明之間的變革〉，頁 83-102。

圖 1 明初吳中醫者關係圖



資料來源：宋濂，《文憲集》；胡翰，《胡仲子集》；楊士奇：《東里集》；金幼孜，《金文靖集》；王直，《抑菴文集》；韓奕，《韓山人詩集》；王行，《半軒集》；王賓，《光菴集》；吳寬，《匏翁家藏集》；焦竑，《國朝獻徵錄》；王鏊，《震澤紀聞》；張大復，《吳郡人物志》；林世遠、王鏊等纂修，(正德)《姑蘇志》。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53-254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 1926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嘉靖辛酉(1561)王可大台州刊本重印。
- 方鵬，《崑山人物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93 冊，濟南：齊魯出版社，1997，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王行，《半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直，《抑菴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1-124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偁，《虛舟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紱，《友石先生詩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00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據明弘治元年(1488)刻本影印。
- 王賓，《光菴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清鈔本影印。
- 王燧，《青城山人詩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00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據明景泰四年(1453)刊本影印。
- 王彝，《王常宗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王鏊，《守溪筆記》，收入《筆記小說大觀》，17 編第 2 冊，臺北：新興書局，1977，據明沈節甫國朝紀錄彙編本影印。
- 王鏊，《震澤先生集》，收入王鏊著，吳建華點校，《王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據明嘉靖初刻本點校排印。
- 王鏊，《震澤紀聞》，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396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據借月山房彙鈔本排印。

史謹，《獨醉亭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永瑤等纂，《四庫全書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朱元璋著，胡士萼點校，《明太祖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1。

朱存理撰，趙琦美編，《趙氏鐵網珊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朱謀塢，《畫史會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扶荔山房本影印。

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80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 1926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康熙四十八年(1709)初刻本重印。

朱彝尊選編，《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

江灌，《名醫類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

吳寬，《匏翁家藏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55-256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 1926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明正德刊本重印。

宋濂，《文憲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3-12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宋濂，《宋學士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246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 1926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明正德刊本重印。

李東陽，《懷麓堂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1681)廖方達刻本。

李銘皖、馮桂芬等纂修，(同治)《蘇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誌輯 9》，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據光緒八年(1882)刻本影印。

李濂，《醫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42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明刻本影印。

汪珂玉，《珊瑚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林世遠、王鏊等纂修，(正德)《姑蘇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 14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正德刊本影印。
- 林鉞、鄒壁等纂修，(嘉靖)《重修太平府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 22 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金幼孜，《金文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姚廣孝，《逃虛子詩續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清抄本影印。
- 姜紹書，《無聲詩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72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刻本影印。
- 胡翰，《胡仲子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108-210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金華叢書本排印。
-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倪謙，《倪文僖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六年(1493)刻本。
- 夏原吉、胡廣等纂修，《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
- 孫繼宗、陳文等纂修，《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
- 徐有貞，《武功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徐春甫著，崔仲平等點校，《古今醫統大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
- 祝允明，《懷星堂全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陳以聞刻本。
- 張大復撰，方惟一輯，《吳郡人物志》，收入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 48，第 149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據清鈔本影印。
- 張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張昞，《吳中人物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97 冊，濟南：齊魯出版社，1996，據明隆慶四年(1570)刻本影印。
- 張輔、楊士奇等纂修，《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
- 張輔、楊士奇等纂修，《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
- 曹溶，《明人小傳》，收入《孤本明代人物小傳》，第 1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

- 縮微中心，2003，據清刻本影印。
- 梁潛，《泊菴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00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0，據清刻本影印。
- 都穆，《都公譚纂》，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明抄本影印。
- 陳田，《明詩紀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0-171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貴陽陳氏聽詩齋刻本影印。
- 陳邦彥選編，《康熙御定歷代題畫詩》，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 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 26，第 109-114 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據萬曆四十四年(1616)刻本影印。
- 黃佐，《翰林記》，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88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嶺南遺書本排印。
- 黃暉，《蓬窗類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6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據涵芬樓秘笈本影印。
- 楊士奇，《東里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8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明刻本影印。
- 楊士奇，《東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8-12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楊循吉，《吳中往哲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89 冊，濟南：齊魯出版社，1996，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楊循吉，《蘇談》，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898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據紀錄彙編本影印。
- 楊榮，《文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解縉，《文毅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趙翼，《陔餘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
- 劉溥，《草窗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2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明成化十六年(1480)劉氏刻本影印。
- 劉鳳，《續吳先賢贊》，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95 冊，濟南：齊魯出版

- 社，1996，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94-119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 錢謙益，《列朝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22-162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順治九年(1652)毛氏汲古閣刻本影印。
-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戴良，《九靈山房集》，收入《四庫叢刊初編》，第 243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 1926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明正統間戴統刊本重印。
- 韓奕，《韓山人詩集、續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3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據清鈔本影印。
- 羅玠、黃承昊等纂修，(崇禎)《嘉興縣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 17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據嘉靖十年(1531)刊本影印。
- 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08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據清光緒刻本影印。
- 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

二、近人論著

- 方志遠，〈「傳奉官」與明成化時代〉，《歷史研究》，2007：1(北京，2007)，頁 41-62。
- 毛培鎬、田渭法、徐榮華，〈戴思恭史料新發現〉，《浙江中醫雜誌》，1988：5(杭州，1988)，頁 222-224。
- 牛建強，〈明人黃暉《蓬軒類紀》相關問題考釋〉，《史學月刊》，2004：12(開封，2004)，頁 39-47。
- 王重民，〈《永樂大典》纂修人考〉，《文史》，4(北京，1965)，頁 171-212。
- 何惠鑒，〈元代文人畫序說〉，收入洪再辛選編，《海外中國畫研究文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頁 246-274。
- 余新忠，〈「良醫良相」說源流考論——兼論宋至清醫生的社會地位〉，《天津社會科學》，2011：4(天津，2011)，頁 120-131。
- 吳以義，〈溪河溯源——醫學知識在劉完素、朱震亨門人之間的傳遞〉，《新史學》，3：4(臺北，1992)，頁 57-94。

- 李新峰，〈論元明之間的變革〉，《古代文明》，2010：4(長春，2010)，頁 83-102。
- 邱仲麟，〈明代世醫與府州縣醫學〉，《漢學研究》，22：2(臺北，2004)，頁 327-359。
- 邱仲麟，〈綿綿瓜瓞——關於明代江蘇世醫的初步考察〉，《中國史學》，13(京都，2003)，頁 45-67。
- 柯律格(Craig Clunas)著，黃曉娟譯，《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柯律格著，劉宇珍、邱士華、胡雋譯，《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
- 席文(Nathan Sivin)著，任安波譯，《科學史方法論演講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祝平一，〈宋明之際的醫史與「儒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3(臺北，2006)，頁 401-449。
- 祝平一，〈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8(臺北，2010)，頁 1-50。
- 高居翰著，宋偉航等譯，《隔江山色——元代繪畫(1279-1368)》，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 高居翰著，夏春梅等譯，《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1368-158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 高居翰著，楊賢宗、馬琳、鄧偉權譯，《畫家生涯——傳統中國畫家的生活與工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 張哲嘉，〈明清江南的醫學集團——「吳中醫派」與「新安醫學」〉，收入熊月之、熊秉真主編，《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頁 256-267。
- 曹昌，〈明奉政大夫太醫院使戴顯——府君墓誌銘〉，收入浦江縣中醫院編，《戴原禮醫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頁 142-143。
- 陳元朋，〈宋代的儒醫——兼評 Robert P. Hymes 有關宋元醫者地位的論點〉，《新史學》，6：1(臺北，1995)，頁 179-202。
- 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7。
- 陳漢雄，〈戴思恭年譜〉，收入浦江縣中醫院編，《戴原禮醫論》，上海：上海科學

- 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頁 148-168。
- 喬迅(Jonathan Hay)著，邱士華等譯，《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 單國霖，〈謝綰「雲陽早行圖」〉，《上海博物館集刊》，2(上海，1982)，頁 251-254。
- 馮麗梅，〈醫學地域化——明清吳中醫家與新安醫家比較研究〉，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 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Bretelle-Establet, Florence. "Chinese Biographies of Experts in Medicine: What Uses Can We Make of Them,"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3:4 (2009), pp. 421-451.
- Bretelle-Establet, Flor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dical Writer's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rough Authorial and Allographic Prefac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9:4 (2011), pp. 249-390.
- Chang, Che-chia.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1874-1908)*.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8.
- Chao, Yüan-ling. "The Ideal Physici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Question of Sanshi 三世," *East Asi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7 (2000), pp. 66-93.
- Chao, Yüan-ling.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1600-1850*.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9.
- Furth, Charlotte. "The Physician as Philosopher of the Way: Zhu Zhenheng (1282-135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2 (December 2006), pp. 423-459.
- Hymes, Robert P. "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s in Sung and Yuan," *Chinese Science*, 8 (1987), pp. 9-76.
- Leung, Angela Ki-che. "Medical Learn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374-398.
- Liscomb, Kathlyn Maureen. *Learning from Mount Hua: A Chinese Physician's Illustrated Travel Record and Painting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mith, Paul Jakov and von Glahn, Richard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Confucian Ident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hysicians in Early Ming Suzhou

Xiao-meng Liu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e early Ming period, the number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Prefecture grew rapid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physicians' lives in terms of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networks. Based on different career patterns, two interconnected groups can be roughly identified: medical officials i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recluse physicians. In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period, medicine gradually became a major career choice allowing men to make a living and to practice the benevolence of Confucianism. Although career patterns and lifestyles differed, they shared an ideal of the Confucian physician and kept intimate social contacts with well-known literati and high officials, which gave them a high reputation in society. This type of social network and Confucian ideal gradually prevailed in Suzhou and was inherited by later generations, which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long prosperit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Keywords: Suzhou, imperial court physicians, recluse physicians, Confucian physicians, social interaction